
目 录

俄譯本出版者的話	1
第一章 “太不可思議了……”	5
第二章 人为的困难	12
第三章 糖業壟斷資本的政府	19
第四章 对人类尊严的褻瀆	33
第五章 我們是怎样当选的	41
第六章 借口找到了	58
第七章 言与行	68
第八章 我們的活动	79
第九章 工党和殖民地	84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	91
第十一章 被告席上的民主	99
尾声	105

俄譯本出版者的話

前英屬圭亞那總理契迪·賈根所著的“被禁止的自由”一書敘述1953年10月間發生的事件。這些事件與該國憲法的被廢除以及政府的被黜免有關。

英屬圭亞那是英國的殖民地，位於南美洲東北部。該國五十來萬人口中，大部分是東亞的移民和非洲人。在英屬圭亞那內地各區荒涼偏僻的森林中，居住着數千印第安人；這是該國原土著居民中倖存的全部人口。居住在英屬圭亞那的歐洲人共有九萬人。

英屬圭亞那的富源（鐵矾土、黃金、鑽石、糖、木材）未用於該國人民的福利，而以極賤的價格輸出國外。在帝國主義者的控制下，英屬圭亞那變成一個甘蔗種植園的國家，變成一個原料供應國，被迫以極高的價格輸入所需糧食和工業品中的絕大部分。英屬圭亞那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極低。該國到處有貧窮和大批失業的現象，後者使本來已很低微的工資更加下降；此外物價不斷上漲，結果人民經常挨餓。

英屬圭亞那民族解放鬥爭的高漲，是圭亞那人民憎恨艱苦的生活條件、無權地位和外國統治的結果。

英國統治集團感到不可能用以前屢試不爽的方法維持住他們的統治，認為必須在許多殖民地進行若干改革。例如在英屬圭亞那，英國統治集團於1953年3月“頒賜”了一

部新的宪法，虽然这部宪法的内容是極其貧乏的。

根据这一宪法，英屬圭亞那成立了由兩院組成的国会，进行了該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1953年4月进行的选举中，得到胜利的是人民进步党。該党在众議院24席中取得了18席。

成立于1950年的人民进步党，是为謀本国自决并增进人民福利而斗争的英屬圭亞那进步力量的民主联盟。該党竞选綱領声称，該党將爭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發展工業，保障工会的自由，进行土地改革。

人民进步党在圭亞那人民的支持下，組成了民主政府，并着手实现該党的竞选諾言。可是虽然英屬圭亞那政府所实施的或准备实施的一切措施并未越出基本民主改革的范畴，英国壟断集团还是認为这些措施威胁到他們在殖民地的統治，因而采取了一切伎倆来破坏这些措施。

在英国糖業和鋁業公司的压力下，以及在与英国、加拿大托辣斯共同控制英屬圭亞那鉄矾土开采業的美国壟断集团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借口所謂在英屬圭亞那揭露的、神話式的“共产党陰謀”，在1953年10月初派遣陸軍部队和軍艦开入英屬圭亞那的首都佐治敦，廢除了实施不久的宪法，解散了合法选出的政府，并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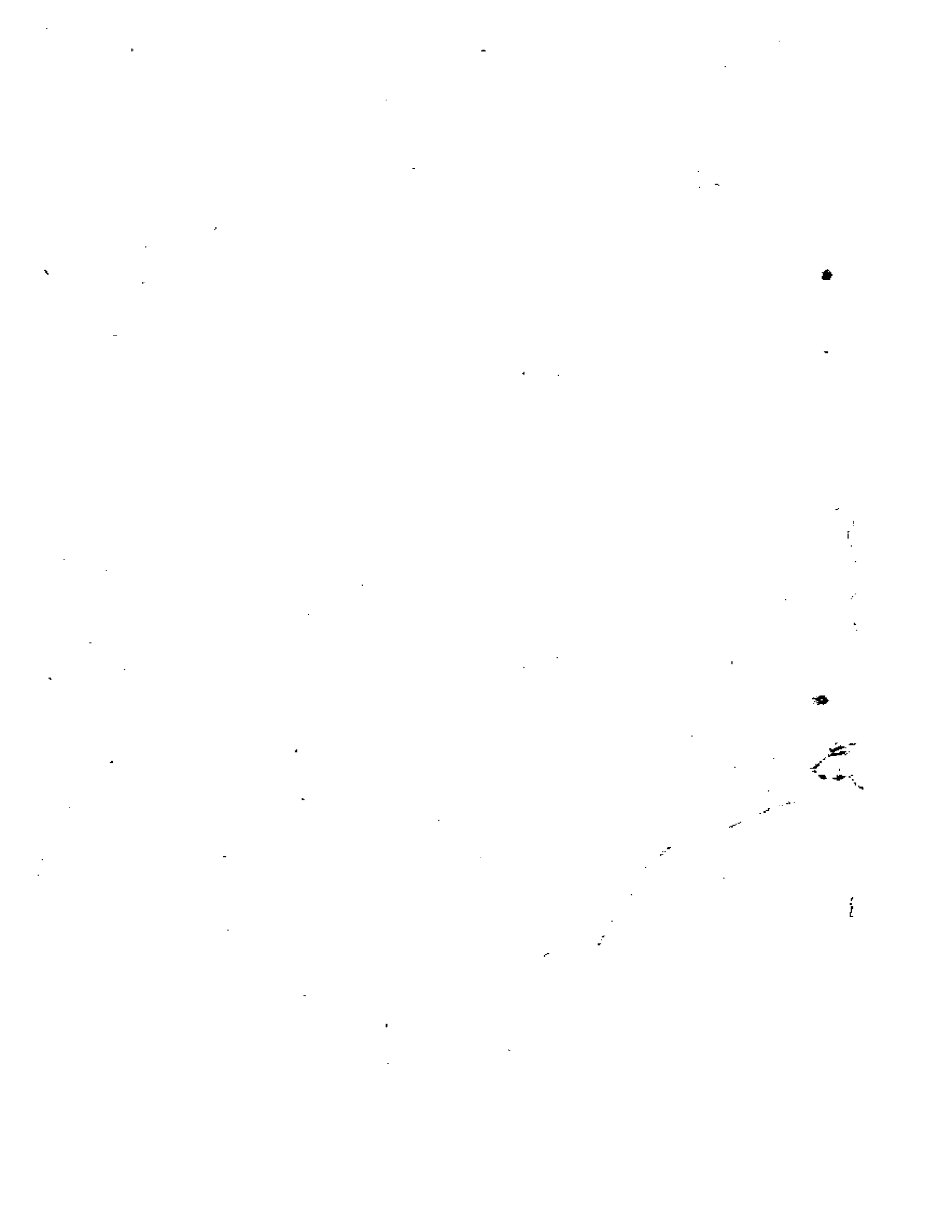
英国政府鎮压了进步力量，剝夺了英屬圭亞那人民不久前开始享有的、本来就很有限的权利，之后便把全部政权交給总督和政府官吏，就这样在英屬圭亞那建成了專制政体。

賈根的“被禁止的自由”一書对这一切事件都有所評述。作者在本書中揭开了这些导致英軍开入英屬圭亞那以及圭亞那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剝夺的事件的内幕。賈根

一再指出，在这些事件中美国起了不小的作用，美国的統治集团唆使英国政府采取更死硬的措施来鎮压英屬圭亞那的进步力量。

“被禁止的自由”一書是賈根的义正詞严的控訴，控訴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与附屬国并殘酷地剝削殖民地人民的政策。

苏联讀者將怀着濃厚的兴趣来讀契迪·賈根的这本評論尖銳而真实的書。



第一章 “太不可思議了……”

兩國願尊重一切人民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凡主權及自治權業已橫遭剝奪者，兩國願目睹其恢復。

——大西洋憲章

1953年10月4日是星期日，早晨陽光燦爛。在这样的日子里，最好躺在床上看看報。但是这一天却不同尋常。大清早便响起了敲門声。

我的一位朋友还没有跨进門就喊道：“你听到新聞了嗎？英国軍隊开来了。据说宪法將停止实施。”

这个新聞并没有使我太慌乱，因为它在我看来是太不可思議了。可是一日之間这个新聞傳遍了首都全城。佐治敦市內人心惶惶。街头巷尾，人們到处談論这件事情。但我認為这是謠言，劝慰朋友們，說沒有任何理由惊慌不安。

的确，在我們的日子裡，在为世界人权宣言*所照耀着的自由的日子裡，哪会有停止实施宪法这样的事情？

可是傳聞竟变成了现实。星期二，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一次新聞广播就使我們完全明白了当前的局势。原来英国

* 作者称之为世界人权宣言的，就是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10月10日通过的人权宣言，其中阐述了国际保护人权的原則。——俄譯注

政府已經通过殖民地部發表声明如下：

“已經証实，共产党人及其同謀者（其中某些人竊据部長职位）的陰謀威胁到該殖民地的福利和正常的治理。如果对此不加制止，他們將企圖采用其它某些国家曾經采用的方法来建立共产主义專制国家。这將导致流血。

根据最近發生的事变，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必須尽速派遣海陆軍部队开往佐治敦（英屬圭亞那首府），以便維護和平并保障社会各阶層的安全。如有必要，联合王国并將派出增援部队。”

“比格布雷·貝”号和“布尔海特·貝”号兩艘快速艦以及“宏偉”号巡洋艦从百慕大群島全速駛来。从牙买加調来了軍队。周末前，“頑強”号航空母艦須从联合王国运来增援部队。

在这个危急的星期內，众議院一直在开会。星期三，我提議廢除那些禁止我們抗議英軍开入英屬圭亞那的現行条例和規章。

众議院議長出面反对我的动議。他說他“一点也不知道”英軍將入境。“难道你沒有听到英国广播公司的报导？”我們問他，“难道你沒有听說軍艦和軍队已經进入我国領海？”“我都听說了，”他答道，“但这还不能算是充分的証据。”議長說，只有在他本人确信英軍开到之后，他才能同意我的這項动議。

第二天下午兩点鐘，我重新提議廢除那些禁止我們抗議英軍登陸的条例。但議長又玩起他那套把戏。他說他“一点也不知道”英軍登陸。

“难道你沒有亲眼看見軍队？”

“我看見了，但是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英軍开到。”

“那到底是誰應該通知你呢？”

原來應該通知他的，是他的頭子，即任命他當議長的總督艾爾弗雷德·賽維治爵士。

後來議長宣布下一天他將把我的動議交付表決。但是這件事並沒有實現，事實上也不可能實現，因為第二天眾議院就不存在了。

當天，即10月9日，圭亞那所有居民都坐在自己的收音機跟前。秘書長以公務人員特有的、呆板而冷淡得無法模仿的聲調宣讀女王政府的決定：

“女王陛下政府決定廢除英屬圭亞那的憲法，以免共產黨顛覆政府，並防止威脅到該地公共秩序與經濟事務的危機發生。……執掌政權的一小撮人以其行動和演詞證明了他們決心採用一切手段直至暴力，來把英屬圭亞那變成共產主義國家。鑑于此，特以非常權力授與總督，並黜免屬於人民進步黨的各部部長。為防止共產黨信徒可能煽起的混亂起見，已派遣軍隊開入以協助警察。”

然後艾爾弗雷德·賽維治爵士發表廣播演說。他號召警察和義勇軍“忠誠地履行交給他們的責任”。他說，英軍開入圭亞那，是為了幫助他們保護英屬圭亞那公民的生命財產並維持公共秩序。但是賽維治不願冒險，他把民警繳了械。

我和我的部長同事們被撤職。眾議院和參議院被迫停止活動。總督利用英國政府授與他的非常權力，成為我國真正的獨裁者。

任何集會都被禁止。不久便對人民進步黨黨部及其領袖的住宅進行了搜查。警察衝進我家的時候，我還穿着睡衣。他們拿去了文件、書籍和錄音機，大概是想找到馬林科

夫的秘密指令！可是他們的暴行还不止于此。警察撬开了我車庫里的地板。当我問他們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警察死陽怪气地笑了一下。原来他們在那里搜索炸彈！

在屋里进行搜查的时候，英国士兵一直包圍着院子。我看着这些年輕小伙子，發現他們的臉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在裝出来的、严肃冷淡的臉色后面隱藏着同情。他們似乎想說：“这跟我們毫無关系。我們是被迫于这些骯髒的勾当的。”这些小伙子是昨天才到的。他們在黑夜的掩护下排着战斗队形登陆，准备杀人，也准备被人杀死。不言而喻，他們事先已經被灌輸过以“恐怖分子”、“土匪”和“共产党”为題的宣傳。可是他們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后来就互相問起来了：“把我們調来打仗，可是到底哪里有战事呢？”

的确曾經放过几槍，可决不是朝着这些“民主的捍衛者”放的。一槍是为了打开我党党部門上的鎖。还有整整一排槍是英国軍队的步槍放的，那是为了庆祝总督發表廢除英屬圭亞那的宪法及黜免部長的声明。

当天黄昏我到自己的办公室和各部去了一趟。所有政府大樓都布滿了警察。他們对我說，只有得到总督的許可后我才能入內。当我終于得以进入我的办公室后，我發現我書桌的抽屜全撬开了，抽屜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而且有許多重要文件已經不翼而飞。

从星期三开始，世界各国的特派記者和攝影記者紛紛来到。他們在我的住宅周圍徘徊，因为就像其中一位記者說的，“下一步棋該你走了”。在他們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危机：沒有任何集会和示威游行，也沒有任何槍声。和平委员会原拟在星期三举行的群众大会，我們决定停止召集——絕不能給警察造成槍击的任何借口。

“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10月9日從佐治敦發出的報導表達了他的全體同行共同的意見。他說：“記者昨日暮飛抵這一到處是棕櫚和小木屋的、為危機籠罩着的城市。抵此已18小時，但記者尚在探尋危機的征象。”

這位記者沒有能找到危機的任何征象。這是不足為怪的，因為這個危機是在白廳*里和在華盛頓虛構出來的。

“非常奇怪的危機，”這位記者對我說，“正在危機如火如荼的時候，市內却在舉行規模宏大的國際板球賽！”

就是上星期發生的輕微的激動，也已經平息。上星期四，眾議院議長拒絕同意廢除現行的條例和規章，並且不允許進行勞工關係法案的初讀。我黨黨員退出了會場，表示抗議。之後召開了群眾大會。我先和總督會談，然後和眾議院議長會談。問題得到了解決：法案在“危機周”的第一天被通過。

居民對危機的態度各各不同。大多數歐洲人，包括富有的葡萄牙人在內，都為之雀躍。至於老百姓則開始是迷惑不解。這個新聞像晴天霹靂一樣使我們，而且我認為也使全世界，大吃一驚。但不久，困惑的感覺就變成冷靜堅強的決心。

我們發表了一篇告人民書，號召人民“保持鎮靜而堅毅的精神”。

人民進步黨發出了一篇以“警覺”為題的通告，號召全體黨員毫不动摇地忠實於黨的事業。

“不論在最近幾天內會發生什麼事情，”這篇通告說，“我們必須保持堅毅的精神，深信我們的領袖一旦被捕，一

* 白廳是英國政府所在地。——中譯注

定会有新的同志起来代替。如果国内宣布戒严，我們大家都應該留在自己的家里，平靜地繼續进行自己的工作，不要理睬人家的挑撥。”

我們号召举行总罢工。我們号召人民消極抵抗，即既拒絕采取暴力，也拒絕合作。警察沒收我們的傳單，并恐吓印刷厂的老板。总督企圖阻碍我們号召举行的总罢工，宣布許多工業部門为“生活必需部門”。可是糖業工人还是掀起了罢工。居民紛紛从邮政儲金局提出存款。抵制英国貨和“波克兄弟公司”所屬商店的运动开始了。我們發出的拒絕合作的号召自有它的效果。总督在“黑色星期五”后仅一周就歇斯底里地号召合作的事实，就証明了这一点。

蹂躪民主，并不是像我們的主子那样所希望的那样一往順利。英国公正的輿論界对英屬圭亞那的事变大为惊愕。我国不像馬來亞或怯尼亞：英国政府無法用关于搶劫、謀杀、暴力和恐怖的、聳人听闻的故事来掩飾自己的劣跡。

在武力的威胁下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这就是英屬圭亞那的事变！虽然英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抬出了“共产主义威胁”这个怪物，但工党党员还是狠狠地抨击了“炮艦民主”，并要求“政府証实自己的譴責”。

前英国殖民大臣詹姆斯·葛里菲斯先生在朴次茅斯發表演說时，要求政府拿出具体的根据。他說：“政府必須向議會和全国証明它的疑惧是有根据的，并且不得用泛泛其談、含糊其辞的声明，而要用具体事实来証明。”

英国政府声明即將就英屬圭亞那問題發表白皮書，并将提交議會討論。我們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啓程赴英。前英屬圭亞那教育部長林·弗·斯·伯納姆先生和我兩人应在英国政府和人民面前陈述一切經過情形。

有一种謠言，說我們兩人不会得到許可离开英屬圭亞那。但英国政府否認这种說法。

可是，虽說我們享有“离境自由”，我們路程上的障碍还是愈来愈多：特立尼达政府和巴巴突政府禁止我們过境；美国副領事拒絕發給我們美国的入境簽證或过境証；荷蘭和法国政府不准我們在荷屬或法屬圭亞那境內逗留一宵，而走这条路綫时却必須經過这个地方；英美的航空公司拒絕我們搭乘它們的飞机。

最后，我們还是办妥了搭乘英屬圭亞那航空公司的“达科他”型巨型客机离国。兩個人乘一架巨型專机的費用是我們所負擔不了的，但是我們沒有其他的出路，因为我們的赴英愈来愈有必要。世界人权宣言除保障其它各种自由外，还保障来往的自由。人家告訴我們，說世界人权宣言适用于每一个人。但看来它只适用于秘書長和其他某几个选定的人士，因为秘書長一路上並沒有遇到任何障碍。他和弗南德斯、卡特、拉庫和肯达尔这几位拥护英国政府的先生們順利地到达了英国。可是要知道，他們去英国是为了感謝女王政府对英屬圭亞那的体貼和关怀。

第二章 人为的困难

圭亞那的脚，踏着鋪滿黄金的土地；
圭亞那的額，頂着布滿星星的太空。
圭亞那踮起足尖，远眺美丽的英吉利；
圭亞那弯下强壮的背，吻着英吉利的手，
溫柔地談出自己的心意：
她願意做我們神聖祖國的
姊妹和女兒……

——乔治·察普曼

那个地方在圭亞那，在那慷慨的黄金国。

——威廉·莎士比亚

英屬圭亞那是南美唯一的英国殖民地。她西接委內瑞拉，西南和南部与巴西接壤，东鄰荷屬圭亞那。她的海岸綫沿大西洋蜿蜒約270哩。

这一资源丰富的国家之所以在經濟上落后，是有一系列的原因的。这一章內，我就想談談其中某几个原因。

常常有各色各样的調查团、委员会、專家和顧問到英屬圭亞那来。他們写下了長篇累牘的报告。但这些帝国主义的走卒几乎每次都是急急忙忙地宣布英屬圭亞那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国家：土地貧瘠，又有种族問題、排水和灌溉問題，等等。据他們說，我們应当考虑到这些困难，从而滿

足于我国已經取得的那些微小的成就。至于帝国主义，当然和这一切問題毫無关系！而且甘蔗种植园主人也根本没有阻碍我国的发展！

英屬圭亞那的面积为83,000平方哩，几乎和英国本土相等。全国面积大約有86%是森林，10%是大草原。我国全部人口几乎都集中在其余4%的面积上；这是一片寬約10哩的沿海地帶，地勢基本上低于海平面。首都佐治敦位于海平面以下8呎，周圍有海堤保护。

圭亞那的气温在华氏75度到90度之間。大西洋的輕風和貿易風使原来一定会非常潮湿的赤道气候較好。雨量充沛。

草原一般高出海平面300到400呎。但在西部与巴西交界处，巴卡拉馬山高达9,000呎；南部的卡納古山和阿卡来山高約3,000呎。

我国內地富于自然資源：各种木材，矿产——鉄矾土、黄金、鑽石、鉭矿、鉄矿、錳矿以及貴重的沙矿。某些地質学家認為：英屬圭亞那因与石油丰富的委內瑞拉、特立尼达毗鄰，一定蘊藏着大量石油。

圭亞那常常被人叫做“河光明媚之乡”。四条大河在我国境内蜿蜒，流入大西洋。柯倫丁河形成我国与荷屬圭亞那之間的国界。伯比斯河、达木拉拉河和艾賽基伯河把全国分成三个以这三条河为名的地区。

英屬圭亞那有两个城市：在达木拉拉河口的佐治敦和在伯比斯河口的新阿姆斯特丹。艾賽基伯河口有許多大島，其中一个島的面积和英国殖民地巴巴突相等。海輪可以沿这些河流上駛60到80哩。

在我国有許多种族定居，所以英屬圭亞那有时被人叫

做“六个民族的国家”。根据英屬圭亞那制宪委员会（1927年）的說法，我国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族之集合体，这些种族的特性、風俗和兴趣都不相同”。我国居民包括印第安人、非洲人、印度人、葡萄牙人、中国人和欧洲人。

据1952年12月調查，英屬圭亞那的人口共有 533,800 人，其中包括：

印度人	207,000
非洲人	162,000
混血兒	49,100
葡萄牙人	86,000
欧洲人	4,100
中国人	3,400

在外国人侵入之前，居住在这个平靜美好的国家里的是印第安人。16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英国人早期的冒險家为了通商，多次航行到巴西海岸。半个世紀后，华德·拉列爵士夢想找到“爱尔多拉多”^{*}，初次企圖把圭亞那併入英帝国。

拉列的把圭亞那併入英帝国版圖的計劃得到許多英国人的拥护。英国人成群結队地来到圭亞那，企圖在圭亞那沿岸地帶定居下来。但是这个計劃使許多人走上了絞刑台，因为英王詹姆士第一不願意和当时統治南美洲并把圭亞那看做禁衛的西班牙爭吵。

随英国人之后，荷蘭人和法国人也来到了圭亞那。他們乘着帆船沿河而上，开办了貿易行，修建了炮台。艾賽基伯河上的吉克—奧佛—艾尔炮台和馥特西蘭地亞炮台至今

* 傳說中的南美洲黃金国。——中譯注

犹在，象征着外国的統治。

歐洲人起先基本上是和印第安部落進行貿易。歐洲人用小玩意兒和其它商品來換天然顏料和棉花。但這種貿易逐漸凋落，人們對煙草的生產愈來愈重視。無數小規模的種植園開始種植煙草、棉花、咖啡、藍靛。到最後，開始種植甘蔗，而且種植的規模愈來愈大。

從英屬巴巴突島和附近的加勒比海各島遷來了英國的種植園主人。他們定居在達木拉拉區。到1770年，他們已經把大多數競爭者排擠出去。1796年，英國遠征軍在巴巴突島登陸，從荷蘭人手里把該島搶了過去。1802年，該島歸還荷蘭。1803年，英國再度侵占巴巴突島；在1814年終於宣布該島為英國的殖民地。

甘蔗種植園買了非洲人做奴隸。非洲人不但運到英屬圭亞那，還運到新大陸其它國家。那時候真是說來令人毛骨悚然的時代，奴隸貿易也是一種說來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意。根據比較保守的估計，由西非到圭亞那、西印度群島和北美13個英國殖民地這一段航程上，約有1,000萬非洲黑奴死亡。

英國在1807年頒布的勅令禁止奴隸貿易。但奴隸貿易並沒有停止。買賣奴隸是一種賺大錢的生意，因為奴隸非常便宜。我曾經參觀過大英博覽會利物浦展覽館，這個展覽館有一部分我記得很清楚。這一部分明明白白地說明了有關買賣奴隸的“三角貿易”如何促進了繁榮的英國的發展壯大。一張地圖上畫出了奴隸船“倫裘”號的航線。“倫裘”號裝着火槍、刀劍、火藥、鉛制食具、棉織品、玩具和珠寶從利物浦開往西非的阿南波，再從阿南波裝了奴隸開到牙買加的京斯敦，最後裝着咖啡、棉花、可可豆、生姜、酒、甜酒和

糖从京斯敦駛回利物浦。在这个“三角形”的每一頂点所获得的利潤促进了英国的繁荣，尤其是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之类沿海城市的繁荣。

奴隶抗議非人的待遇。有些人逃跑了，有些人掀起了暴动。最后一次暴动是在1812年被鎮压下去的。参加这次暴动的約有一万名奴隶。尽管某些拥护奴隶貿易的有势力人士，如市議員、教会人士(埃克塞特主教)和海軍將領的猛烈反对，但是由于奴隶的反抗日益加剧，廢除奴隶制协会在巴克斯頓、威尔伯福斯等人参加下展开了运动，奴隶貿易終于停止了。

不久英国政府取消了食糖特惠权；甘蔗种植园主人陷入了極其窘困的境地。他們不得不在公开的市場上出售糖，与利用奴隶劳动生产糖的巴西、古巴竞争。英屬圭亞那的得到解放的奴隶要求每日工資一先令。要使糖業不經過根本的变革而度过这个难关，要使高額利潤不致降低，就必须以廉价的劳动力供应糖業。

于是新的契約制便应运而生了。紙的手铐脚镣代替了鉄制的手铐脚镣，但是紙的还是和鉄的一样结实。种植园主人付給每名訂立契約的工人每日1先令2便士到1先令3便士，这和被解放的奴隶所要求的工資約略相等。种植园主人从中国运来了中国人，从印度运来了印度人，从馬得拉島运来了葡萄牙人。但是他們都忍受不了种植园里沉重不堪的工作。

糖不但在圭亞那，而且在加勒比海整个地区，在加勒比海的島嶼和沿岸，成为君临一切的帝王。英国占領150年以来，統治着圭亞那的一直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帝国主义者对發展平衡的經濟从来沒有关心过。在这段时期內，甘

蔗几乎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农作物。尽管我国地广人稀，尽管只开垦了4%的土地，我国居然还在大闹土地荒！

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赖输入的商品粮食为生。我国输入面粉、乳酪、黄油、奶粉、肉、鱼、豌豆、大豆、果酱、糖果及其它食物。英属圭亚那既然是殖民地，就没有加工工业。帝国主义者只想榨取我国的木材和矿产——铁矾土、黄金、鑽石、钽矿。目前正在加紧勘查锰矿、石油和放射性钍。获得各种特权的外国资本家仅对开采矿产发生兴趣。

我国对进出口贸易不加管制，因此进行贸易的方法常常违反我国的切身利益。英属圭亚那一直执行着高价买进、低价卖出的传统政策。下面这个表引自本纳姆博士在1942年发表的著作“英属圭亚那的国民收入”。该表说明：自1938年到1943年，进口价格上涨了136%，可是出口价格到1942年上涨了32%，而到1943年又下降到25%。

	进口价格	出口价格
1938	100	100
1939	99.5	117
1940	130	119
1941	145	126
1942	194	132
1943	236	12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经济学家纽马克博士曾在1950年以加勒比委员会代表的资格访问西印度。以前他曾把1938年作为情况最好的一年来计算，认为整个西印度在1947年必须把出口数量增加38%，其中糖增加36%，这样西印度才能获得数量与1938年相等的面粉和咸鱼。

调整我国外汇兑换率(因英镑贬值)的结果，我国情况

更加惡化。可以說是只過了一天，生活指數就上漲了16點左右。

我們被禁止全部花去我們所得到的美元。比如在1951年，我國賣給美元區國家（主要是加拿大）的貨物值3,150萬美元，但我國只被允許購買價值1,450萬美元的貨物。請把這一數字和我國向英國出口的數字（1,500萬美元）以及從英國進口的數字（2,700萬美元）作一比較吧！

此外，英屬圭亞那的資金經常以津貼、利潤、息金和儲金的形式外溢。英屬圭亞那的兩家銀行——“加拿大皇家銀行”和“巴爾克萊銀行”——以及大部分的保險公司，都屬於外國人，由外國人經營。甚至我國的郵政儲金局也掌握在英國殖民大臣的手里。殖民大臣可以隨意支配郵政儲金局的資金。

這就是若干對我國經濟有決定性影響的因素。它們和“種族問題上的困難”或地理條件毫無關係。這些因素是人工的，是外國統治的後果。

第三章 糖業壟斷資本的政府

酷熱襲來，整個季節不見一絲雨意，庄稼枯萎在田里，甘蔗喪失了它的豐富的漿汁，這時候，他們大聲叫嚷：“這些人太懶了，他們不干活！”

他們把牛馬趕到黑人種植糧食的土地上去的時候，他們把黑人住屋的大門折掉的時候，他們把佃租提高到無以復加的時候，他們把人們逼得四處去尋覓一小塊地方希望能自由自在地耕種土地并享受果實的時候，他們仍舊喊道：“這些人太懶了，他們不想干活！”

他們忘記了：他們占有土地，從來不是為了把自己的金錢投入一種進益雖不太大、但已足夠的事業。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們占有土地，只是為了投機，為了只費一些微不足道的資金而獲得大得出奇的利潤。

——摘自約翰·史密斯的故事
“達木拉拉的殉道者”一書的
序言（寫於1848年）

人家告訴我們，說糖是英屬圭亞那經濟的基礎。這個基礎一遭到破壞，我們的政府就會垮台，成千成萬的人就不免受害。我國全部耕種面積的1/3左右是種植這一主要的作物的。糖在我國出口貿易中占60%以上。它是帝國主義

者的力量和威勢的源泉，同時又是我國經濟中的弱點。

糖在英屬圭亞那農業中扮演的角色極其重要，以致我國的歷史在實質上就是一部糖業史。這部歷史中充滿了掠奪、謀殺和流血事件。加勒比美洲* 著名的歷史學家艾里克·威廉斯博士在他寫的“資本主義與奴隸制”一書中寫道：“真奇怪，像糖這樣甜而又人類不可或缺的東西居然是引起多次血腥罪行的罪魁禍首。”就在不久前的1948年，恩穆爾的一個種植園里還發生了五名工人被殺，若干人重傷的事。

農業政策一向是這樣的：與其說它“考慮到”糖業問題，倒不如說它是“根據糖業問題”決定的。甘蔗種植園的主人絕大多數是不住在圭亞那的英國實業家。英屬圭亞那有三家大公司（在英國註冊）——“波克兄弟—麥克康尼爾公司”、“德夫遜公司”和“達木拉拉公司”——幾乎完全控制了我國的糖業。

三家公司中最大的是“波克兄弟—麥克康尼爾公司”，它是英帝國主義在英屬圭亞那的標志。它對我國經濟生活影響極大，以致有時在談話中“波克圭亞那”竟成了英屬圭亞那的同義詞。這家公司控制着我國大部分甘蔗種植園，總產量約占全國糖產量的70%。它擁有12個甘蔗種植園以及我國所有16家制糖廠中的11家。

在“波克兄弟公司”中工作的工人約有38,500人。該公司在我國擁有50來個女兒公司，還擁有其它某些康采恩的股票，並在商業部門占統治地位，經營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商品。它通過坎貝爾、波克、卡透公司輸出多種貨物並進

* 即指加勒比海沿岸各國。——俄譯注

行國內貿易。它在佐治敦開設着一家規模宏大的百貨商店。

“甜酒聯合批發托辣斯”控制着英屬圭亞那境內的“波克甜酒公司”和“阿爾比昂釀酒公司”。此外，“波克兄弟公司”還擁有一批商船，來往于佐治敦和利物浦之間以及西印度各島之間。

不久以前，“波克兄弟公司”把几家鋸木廠的股票和若干森林賣給“殖民地開發公司”，獲利甚厚。“波克兄弟公司”有一筆數目很大的資本投入最大的畜牧公司——“魯普奴尼墨殖公司”。後者的董事長是“波克兄弟公司”的董事艾·格·西福。目前擔任“波克兄弟公司”倫敦分公司經理之職的弗·杰·西福爵士，以前是“達木拉拉鐵礦土公司”的董事。

人們都說：“波克兄弟公司”什麼行業都要插一手，就是不開殯儀館。這家公司想盡一切方法剝削人們，可就是不料理後事。

“波克兄弟公司”的股東包括：“阿特拉斯保險公司”、“伯明翰與地方投資信託公司”、“巴爾克萊銀行”、“倫敦人壽保險公司”，等等。

糖業中重要性僅次於“波克兄弟公司”的，是“達木拉拉公司”。它是在1891年由英屬圭亞那最老的一家公司——“桑德巴赫·丁公司”——創立的。“達木拉拉公司”現任董事中有：創始人之一的玄孫伊·魯·帕克、利物浦銀行家家庭出身的特·阿·泰勒。該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是鮑威克·豪克斯黑德勳爵。

“德夫遜公司”擁有三塊地產和一家工廠。該公司基本上屬於德夫遜家族；董事長是哈里·姆·德夫遜中校。股

东有辛克萊勳爵、乔弗雷·德夫遜爵士和他的岳父瑞斯·威廉斯爵士，此外还有馬戈特·德夫遜夫人等人。

这些公司和加勒比海英国势力圈内的其它公司一样，有設在倫敦的、有势力的“西印度委员会”給它們撑腰。这个委员会的代表一向厕身于我們的实际統治者之列。

比如，弗·杰·西福爵士在1947年的大选中失敗后，被任命为英屬圭亞那立法會議和行政會議的議員。弗·杰·西福爵士就任“波克兄弟公司”倫敦分公司經理后，原职由“桑德巴赫·帕克公司”和“达木拉拉公司”的代表弗·摩里許先生繼任。一度占据政府高位的“糖業生产者协会”干事吳·阿·馬克尼先生后来繼任摩里許先生的职务。

在1947年到1953年这一届立法會議的議員中，有几个民选的或官方任命的議員直接或間接与糖業有关。吳·拉特吉佛和克·維·章特是“蕭納德—維賴尔斯地产公司”的股東。其中后者的父亲普·克·章特是“恩穆尔地产公司”的董事。由总督任命为立法會議議員的格·赫·斯麦利握有“恩穆尔地产公司”的股票，他以前是“德夫遜公司”的董事。也是由总督任命为立法會議議員的西里尔·法农是“汉弗雷公司”的秘書。

在我們被排挤出立法會議后英国政府召集的新的第一届立法會議中，吳·拉特吉佛、格·赫·斯麦利、西里尔·法农和吳·阿·馬克尼都获得了議席，只是他們都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

糖業資本家除在立法會議中有間接的代理人外，还派代理人打入政府各局和委员会，例如土地疏濬局、中央衛生局、运输与港务局、市政事务局，等等。

由于这样参与国家的行政，甘蔗种植园主人得以根据

一己的私利来决定主要的政策問題。政策一旦决定，就一定付诸实现。制定政策和施政之間的关系極其密切，以致几乎無法确定兩者之間的界綫。其原因是殖民帝国内的总督及其它高級职位只讓英国官吏来担任。而且，誰要得到这些职位，誰就必须对英帝国主义五体投地。在英屬圭亞那任职的那些官吏都很明白：他們要想昇迁，就必须想尽方法来保衛糖業大王的利益。所以有許多退职官吏現在担任着直接或間接与糖業壟断資本有关的高級职务。

劳工問題以及甘蔗种植园主人企圖如何解決这个問題，这是一个極足以令人深省的題目。很久以前，保持数目足够的后备工人以便使种植园获得廉价劳动力这样一个任务，就已成为甘蔗种植园主人的主要困难之一。

起初是非洲运来的黑奴解决了这个問題。奴隶制廢除后，种植园主人开始利用馬得拉島、中国和印度的移民，讓他們簽訂为期五年的卖身契約。但在1917年这种制度也被廢除了，使种植园主人大为归兴。他們也曾企圖利用亞述人*和被迫背井离乡的犹太人，可是也失败了。因此，尤其在1917年后，种植园主人探求了其它的方法，来保証以必要的和后备的劳动力供应种植园并弥补劳动力外流的現象。

这些方法各各不同：片面地發展农業中的某些部門；用各种方法阻碍佃地；故意拖延疏濬或灌溉甘蔗种植园范围以外的土地；冻结工資并拼命压低自耕农产品的价格。有一个方法——扑灭瘧疾——是以人道措施的姿态出現的。

瘧疾和飢餓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1949年度英屬圭

* 亞述人（或称西利亞人）是一种操新叙利亞語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亞述人數居在北伊朗和土耳其，一部分居住在南高加索。——俄譯注

亞那報告書中說道：

“自1838年廢除奴隸制時、到1917年，自印度、非洲、中國、馬得拉島及其它國家遷居英屬圭亞那的移民達43萬人。即使扣去部分回國的人數，仍然可以說移民大致保持這個數目。可是1911年英屬圭亞那的人口才309,000人，而在1921年只有307,000人。”

甘蔗種植園主人並不希望他們的工人死去，因為從死人身上是榨不出利潤來的。這樣就必須撲滅瘧疾。“糖業生產者協會”醫藥顧問杰格利奧利博士在1946年度英屬圭亞那報告書中指出：由於使用了“DDT”，嬰兒死亡率急劇下降。生育率也大大提高。學童的瘧疾得病率在1938到1945年間為60%，在1946年降低到18%。

英屬圭亞那的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哩5人，巴巴突島為每平方哩1,246人，格林那達島為每平方哩613人。請把這些數字比較一下吧！可是我國農民居然還因缺乏土地而受苦受難。

據最近統計，每個中農有3.75英畝土地，而這些土地還是沒有很好經過疏濬和灌溉的。可是許多專家認為：要維持正常的生活，必須擁有15到20英畝很好地經過疏濬和灌溉的土地。無法獲得土地這樣一個事實，說明了為什麼缺乏各種食物。把1950年發生水災以後的一段時期不算在內，多年來英屬圭亞那一直缺乏本地產的植物油和動物油。

1948至1949年期間，缺乏油料的現象極其嚴重，以致不得不花了約七萬元寶貴的加拿大貨幣以現金交易的方式買進加拿大的豆油。1952年從荷蘭和特立尼達島輸入了大量植物油。如果以前農民有可能獲得土地的話，他們之中一

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至少划出三五英亩来种植可可豆。可可豆的不足，不但意味着可可油的生产縮减，还意味着椰子仁的生产縮减。而可可油和椰子仁的不足又影响到飼猪業、牛奶業和肥皂制造業。

在有时称为“荒凉地带”的艾賽基伯河兩岸，大部分农民只有几英亩地；这些土地基本上用来种稻。而因为稻是一种季节性作物，絕大多数的人大半年沒有工作。艾賽基伯河兩岸經濟之所以处在悲慘的境地，主要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因为这一帶甘蔗种植园的蕭条。糖不仅是引起艾賽基伯河兩岸，而且还是引起其它地区經濟崩潰的罪魁禍首。甘蔗种植园主人因为恐惧失去劳动力，毫不致力于促进国内其它地区的經濟高涨。

广大的土地未被利用或利用得不恰当。甘蔗种植园主人直接控制了17万英亩左右的土地。1950年的賦稅表明：他們拥有的土地中有50%以上一直沒有耕种。其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政府向种植园主人征收的地租，几乎有9万英亩的土地，平均每英亩仅收5分錢。1951年，我在国会中提出一項动議，建議廢除租地契約或向甘蔗种植园主人征收他們名下的荒地的土地稅。這項动議沒有通过。

为什么要占有这样多的土地而又不加以利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們可以在故意采取的限制政策上找到答复。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甘蔗种植园附近保持大量的剩餘劳动力。把一英亩或半英亩土地分給每一工人去耕种，就足以阻止工人公开对朝不保夕的处境、对低微的工資过份不滿，阻止他們在失業季节流动到其它地区。非常明显，不能給工人很多土地，否则工人就能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結果在

經濟上不需依賴別人。

为了强迫工人不干对工人較有利的工作（例如种稻及其它粮食），为了保証使工人每周有更多的劳动日来替种植园做工，种植园主采取了收回土地的办法。在1943—1947年期间，种植园主从基本工人手里几乎收回了2,000英亩稻田和1,000英亩种植其它作物的土地。

金氏在1944年發表的“甘蔗种植园內計件工作的若干問題”报告書中說道：“……現有工作之所以未完全完成，其原因是基本工人認為在自己的稻田和农場里干活較有利，而部分临时工人則往往因为找到了較有利的工作，就把种植园里的工作扔掉了。”

劳工局1948年度报告書中引用的資料表明，达木拉拉区东班克各种种植园內的劳动日平均数字高于我国其它地区。

“其原因，”报告書說，“可能是由于东班克的工人沒有自己的稻田和农場，因此在較大的程度上依賴于他們的工資。”

土地占有和土地荒这个問題与排水和灌溉这个重要問題有密切关系。

皇家委员会1945年度报告書中說道：“……事实上，經過很好地排水的土地全部种植甘蔗。……稻田和牧場的排水工作做得很差，沼澤地帶星罗棋布。在这些地方，牛、羊、猪采取了不習慣的生活方式。它們几乎变成了兩棲动物。”

土地的排水和灌溉一直受到甘蔗种植园主人的監督。弗·杰·西福爵士曾任“土地排水委员会”主席多年，后来由“达木拉拉公司”的代表弗·摩里許繼任。摩里許退职后，

这个职位由“糖業生产者协会”干事吳·馬克尼取得。

政府曾經任命弗·哈欽遜为排水与灌溉問題顧問，而国会也曾撥出数千元以供初步勘查之用，这是真的。但种植园主人曾坚决反对哈欽遜提出的規模宏大的排水与灌溉計劃，这也不是虛構的。

哈欽遜对排水和灌溉問題的看法跟种植园主人不一致。哈欽遜認識到英屬圭亞那的工業化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因此認為只有另外再把成千英亩土地予以很好地排水并正确地灌溉，才能提高全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并解决日益严重的失業問題。

每年都有人劝告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1951年，財政部長引証弗列丘委员会的报告，說：1949至1950年生活指数上漲的14点中，只有4.1点是出于本地产品价格的上漲。但是財政部長却只字不提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即1950年初發生的水灾。

在哈欽遜与种植园主人之間的斗爭中，政府站在种植园主人方面。哈欽遜結果失敗，离开了英屬圭亞那。他曾經拟訂了在全国范圍內进行灌溉的宏偉計劃。他算出：在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下，如果每戶分得25英亩，則全国所有可开垦并适于耕种的土地可在17年內开垦完畢。所以他坚持立即实现他的計劃。

甘蔗种植园主人反对哈欽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一旦实施哈欽遜的計劃，在很短期間就会有大量經過排水并得到灌溉的土地适于耕种；第二，这样一来，糖業大王就要破財。

毫無疑义，种植园主人非常努力于經售农产品、規定农产品的价格以及冻结工商業职工的工資。原因是很清楚

的：工人要想离开种植园，就必须找到另一个工作或成为自耕农，而如果这对他不合适，他就不得不留在原地。因此，必须把工资和农产品价格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上。

种植园主人为什么要反对通过最低工资的法律——对于这个问题，也正是要根据上述事实来考察。1950年我在立法会议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时候，只有四个议员支持我。

至于控制价格的事情怎么样呢？我们举大米销售委员会为例。这个委员会的权力全部操在政府委任人员的手里。它由八名政府委任的官吏和八名大米生产者组成。现任主席是一个政府官吏。

成立大米销售委员会的理由，是消灭那些剥削大米生产者的中间商人。但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真正目的，是阻止出口大米的价格上涨到第一次大战时会达到的数字，即每袋20—25元，因为这样会引起农民由种植甘蔗改种大米。

长时期内，我国大米的价格几乎比国际市场上低一半。例如：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美国	215.54元	247.77	364.66
巴西	179.00	200.17	234.70
英属圭亚那	105.52	115.61	115.96

据最保守的估计，自大米销售委员会成立以来，农民至少损失了1,000万到1,500万美元。

大米销售委员会之所以在1950年批准英国政府“殖民地开发公司”和英属圭亚那政府准备合办的一个公司可以不受米价管制的限制，其原因就在于此。大米销售委员会

由糖業資本家控制着；如果“殖民地開發公司”竟不得不通過這個委員會來銷售大米，那“開發公司”當然就會失去在爭奪勞動力上壓倒種植園主人的希望。所以“殖民地開發公司”竭力爭取自由地生產并銷售大米。

上述情況既引起農民，也引起進步政治家的堅決反對。顯然不應當有兩種不同的法律來適應利益不同的集團。大米銷售委員會這個機構或應撤消，或應改組得符合于共同的利益。但是1951年夏，立法會議否決了一項關於這個問題的提案。這項提案建議撤消大米銷售委員會，另外成立一個機構，單獨負責大米貿易，并由生產大米的農民在民主和合作社的基礎上加以監督。

後來“殖民地開發公司”得出結論，認為大米業並不是一樁利潤很大的買賣，因此選擇了一條比較保險的道路，即貸給經營大米的“萊斯堡殖公司”500萬元。這筆貸款的利息要比“開發公司”向英國財政部借款所付的利息高 $\frac{3}{4}$ 。

甘蔗種植園主人還盤踞在政府貿易委員會中。這個委員會是規定農產品的最低保證價格的。價格通常規定得極低，結果農民生活困難。政府官吏硬說，因為在市場積貨過多時，政府糧食儲備就虧損很大，而一旦提高價格，虧損就會更大。

即使土地不能到手、佃租高昂、土地的排水和灌溉情況惡劣、農產品價格低廉、工資微薄，工人仍不願留在甘蔗種植園及其附近的地區，因此種植園主人採取了新的方法，即修建工人村。據種植園主人計算，基本工人共有5,262戶，非基本工人和臨時工人共有6,555戶。種植園主人宣布準備供給基本工人住宅，并在種植園中給非基本工人留下了9,334塊地皮以供修建房舍。在某些場合，種植園主人居然

向工人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在目前，由政府指定成立的糖業福利基金委员会正在用糖業基金發放贷款。

这一新方法的目的是把工人，甚至把非基本工人，束縛在种植园上，同时又乘机从事利潤極厚的生意，即把土地佃出。

种植园主人和工人签订的佃租契約中，某些条款禁止工人种植果树和飼养家畜。这好像是为了衛生，而实际上是因为种植园主人不愿意工人在經濟上独立。佃租为每年2.88元。这是一笔非常有利的买卖，因为从預定修建9,334所住宅的1,228英亩土地上，每年可收租費28,293元；而种植园主人付給政府的地賦每英亩仅5分錢。

种植园主人获得巨大的利潤。他們喋喋不休地說糖業是种不合算的生意，但事实所表明的却和他們所說的相反。自1948年至1950年，“波克兄弟公司”納稅后的純利潤自207,455英鎊增加到385,453英鎊。1951年該公司的純利潤總額为660,677英鎊，如与稅款、小股東紅利、公積金合計，則达2,237,904英鎊。还应指出，上述金額中并没有包括該公司董事和高级职员所得的高額薪俸。

人家責难我們人民进步党人，說我們要破坏糖業。我党的政策从来不曾而且以后也永远不会追求这样的目的！但是我們坚决反对糖業現有的体系和組織。因为在这样的体系和組織下，工人被殘酷地剝削，他們用劳动挣来的千百万塊錢流入了英国糖業大王的腰包。

糖業所生产的財富必須分配得比較公平合理，讓工人有过得去的生活水平。为了工人的利益，也为了整个英屬圭亞那的利益，必須尽快地改进种植制度，必須关心到季节性失業工人、束縛在种植园里的工人以及糖業后备工人。

这一改組可以以全盤国有化的形式进行，也可以以改革的形式进行。我們的政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因此我們的目的是实现糖業乃至所有基本工業部門的国有化。但是在英屬圭亞那还附属于英帝国主义的时候，在我国宪法还很不完备的时候，必須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便挫敗帝国主义。

亞瑟·刘易斯教授在其报告“土地問題”中这样說到糖業：

“必須尽快地試驗新的改組形式。在波多黎各，政府非常重視这一問題。波多黎各政府应受到極大的讚揚，因为它帶头試驗了比例利潤制农場。

至于在英国各屬地，政府对待各种騷乱的办法是成立各种調查委员会，到此便認為万事大吉了。但是光这样做是不够的……必須寻求新的途徑，使西印度的糖業退出‘政治舞台’并使它不再成为公众的眼中釘。否則西印度迟早会把自己的經濟基础連同糖業一起破坏掉。”

波多黎各規定了种植园的土地限額——500英亩。这个限額以上的土地由政府收买后分給农民。个体农户分得的土地可达25英亩。此外，在波多黎各創办了比例利潤制农場(农場工人除淨工資外还分紅)和合作社。

刘易斯教授在同一报告中援引斐济群島現行农業制度。他說：

“某些人相信，这就是能使西印度糖業問題終于得到解决的制度。办法是由一个大規模的代理机关来翻耕土地，管理灌溉事宜，供应种籽和肥料，組織收割，指导制糖厂生产；而农民則在盈亏自負的基础上种植并栽培作物，并向代理机关付服务費。农民將有自己的代表會議，但它并不是

去履行代理机关的任务。在斐济群岛和苏丹，这样的代理机关一直是私營的，但是也完全可以公營，就像目前在苏丹境內准备做那样。”

英屬圭亞那哪怕就采用斐济群岛的制度，我国工人的状况也会比现在好。当維恩委员会訪問英屬圭亞那时，我曾遞交一个关于糖業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备忘录，其中計算了种植一英亩甘蔗的平均費用。根据工人、司机和會計提供給我的資料，我确定：1948年为了栽植与收割一英亩甘蔗并把它运走而付的工资平均是 86.89 元。肥料、騾、牛和船的平均費用为每英亩 33.24 元。如果以 1948 年农民向种植园主人出售甘蔗的价格来計算，每英亩收割的甘蔗平均价格为 243.33 元。由此可見，剝削率約为 142%。換句話說，工人每日劳动 10 小时，其中得到报酬的只有 4 小时左右，其余 6 小时左右是給种植园主人义务劳动。

糖業壟断資本不仅从糖業中取利，而且还毁灭全国。糖業壟断資本的政府必須由人民的政府来代替，这样的时机已經成熟了。

第四章 对人类尊严的褻瀆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他在亲眼目睹之前竟能想像得到我們英联邦內多少同胞身受的貧窮。

——前殖民大臣詹姆斯·葛里非斯于1951年10月
摆在殖民地人民面前的基本問題，是他們的可怕的貧窮。貧窮是殖民地社会一切灾难的根源。这是經常飢餓的問題，是死于本来可以防止的瘧疾、死于飢餓的問題，是愚昧的問題。而愚昧是統治集团造成的，因为他們竭力想利用愚昧来給地主、矿坑和种植园的主人供应廉价的、順从的工人。

——庫瑪·戈夏尔著“殖民地人民”

英屬圭亞那有时被人称为“美好的地方”。对少数人來說，帝国主义的統治的确把我国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使他們生活得舒适豪华。可是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却貧困、艰难、痛苦。这一点，我們到处可以找到証明。

前几年，麦克米倫教授在他写的“西印度發出的警告”中說道：“对西印度的社会和經濟作任何研究，結果……必然是研究貧穷現象。”

前美国国务院官員保罗·布蘭查在他写的“加勒比美洲的民主和帝国主义”一書中說道：

“整个加勒比美洲的劳动人民几乎全都生活在伤害人类尊严的条件下。加勒比美洲贫穷的外部征象是衣服襤褸；蓬头赤足；肚子浮腫的兒童；用打扁了的空罐頭釘成的小屋；排在大門緊閉的办事处前的失業工人队伍。”

自这些話写下后情况变得很少，即使有些变化，也不过是变得更坏。印度駐西印度代表斯·姆·薩海曾在1951年初訪問英屬圭亞那、特立尼达和牙买加这三个当时最發达的地方。他也得出了同样的結論，他說，这三个地方最典型的特点是貧穷。

在联合国粮食及农業組織任职的英国家政学家伊尔薩·赫格蘭女士在1952年10月告訴我們的立法會議議員，說她难得看到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貧穷征象，并說她感到“極度的震惊”。可是她所說的主要是指柯倫丁区，而該区还算是英屬圭亞那最正常最繁荣的地区呢！

下面是某一位糖業工人的証詞的片断。这篇証詞是他在以維恩为首的英屬圭亞那糖業工人狀況調查委员会所作的。

“主席：你想告訴我們些什么？”

証人（印度人）：我們每天去上班要走五六哩地。我們早上六点就要离开家，这样才能在七八点开始干活；下午一直要干到五六点。

主席：你在一年里头一直是要走这些路去上工，还是有时候要走这些路？

証人：我几乎一直是要走这些路。

主席：你就是在这一点上不满意？

証人：不。我没有稻田，没有牛，也没有錢。我住在种植园的小木屋里，我给种植园干活。我是一到圭亞那就在

种植园里干活的。

主席：你上礼拜挣多少錢？

証人：我以前每个礼拜挣5元到10元。不过我現在已經老了，每礼拜挣的錢超不过5元到7元。这些錢是不够維持生活的。我要是买了衣服，这个礼拜就不能买粮食。”

1942年，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阿尔波 艾斯敦(佐治敦的一个工人区)調查了生活費用。調查后証明：4.6口人的中等工人家庭每星期收入7.41元，而支出为8.23元。

每星期收入里不仅包括工資，而且还包括約占总數20%的其它收入——貸款、养老金、貧民补助金等。这一点再一次証明了：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尽管有什么补助金，尽管有慈善机关的援助，劳动人民总是入不敷出的。正因为入不敷出，所以工人不能及时付房租，不得不向小鋪子賒購食物。这样一来，他們总是寅吃卯粮。

8.23元(1元等于4先令2便士)的支出是这样分配的：

食物	4.58元
衣着	1.07元
房租	1.07元
燃料和电灯費	0.47元
其它	1.04元

工人吃得怎样？当时任政府衛生部門官員的弗蘭西斯博士这样說道：

“每人每日食物的热量为2,134.4卡路里，可是国际联盟食物营养問題技术委员会确定：一个人，即使他不劳动，每日也需要2,400卡路里。此外，我国工人的食物中养分很不平衡，碳水化合物太多，蛋白質和脂肪太少，而且蛋白質中大部分不是得自动物的。”

兒童問題怎麼樣呢？對這個問題，可以從政府在1948年發表的十年計劃報告中找到答復。這一報告附有半官方食物營養問題委員會的備忘錄，其中說道：

“我們在全國各地廣泛調查後肯定：學童中至少有25%的人很貧苦。”

童年營養不足，以後會衰弱多病，死亡率高，壽命會縮短。我國兒童的死亡率以及婦女在生育時的死亡率極高。英國的兒童死亡率為每千人32人，美國為31人，而英屬圭亞那為86人。請把這些數字比較一下吧！

肺結核病患者在1947年為215人，1949年增加到532人。在“白斯脫醫院”登記申請住院的病人在1949年為329人，1951年增加到548人。

住宅工程方面的情況也同樣不體面。調查生活費用後證明：每間房間平均住2.6人，在某些場合達12人。

居住條件愈來愈壞。在人口占英屬圭亞那1/5的佐治敦，貧民窟比比皆是。許多房屋逐漸坍塌。我本人就知道有這樣一幢房屋，住在這幢房屋里是有生命危險的，但住戶還是一直住到它完全坍塌的時候。這幢房子坍塌的時候，裡面還有50人。

我國人口的18%左右住在種植園的木板屋里。這些木板屋還是奴隸制時代造的，現在都已經殘破不堪了。維恩委員會的報告中關於這些木板屋這樣說道：

“我們到過許多房屋。這些房屋的用波狀鐵板做成的屋頂都已經漏了。房屋的結構也都殘破不堪。我們到處看見床上面張着布幕或搭着蓋板來防雨。地板是泥的，因為下雨時屋頂漏水，弄得很滑。在許多房子里，地板上鋪着布袋，讓人不致跌交。這些房屋修建得毫無計劃，地勢

低而凹凸不平。沒有人行道，下雨天几乎無法在路上来往。

公共廁所常常修在排水溝旁，而且十分破爛，几乎是四面八方都敞開。”

我国常常下大雨，發大水。我們可以想像到在那样的日子里种植园工人的衛生条件和居住条件。住宅周圍到处是从滿滿的糞坑里流出来的髒水。髒水几天甚至一星期不退，这时候人們只能以船代步。

至于种植园經理和職員的住宅，則位于干燥的地方。1950年發大水的时候，我曾往訪魯悉南某种植园的經理，請求他修筑一条堤来保护工人的房屋，还請求他装一台抽水机来抽去髒水。

可是經理对我的問題避而不答，反問我知道不知道我没有权利不得允許擅自进入他的土地，虽然这个种植园是在我的选区內的。結果抽水机自然沒有安上。

据計算，在农业局所屬地产上为政府高級官員修建的四座住宅竟花了96,000元。

英屬圭亞那不仅需要正常的生活条件，需要較好的居住条件，需要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而且还需要徹底改革教育制度。

我国的初等教育是义务的，但几乎所有学校都缺乏師資和設備，而且学校收容的学生人数过多。1948年發表的十年計劃报告中承認，当时約有13,000名6—14岁的兒童失学。

1951—52年关于初等教育政策的报告中指出，有一个供400名兒童就学的学校收容了800名学生，这并不是希罕的事。

报告接着說：

“每班往往有60名学生，但这个数目很快增加到80、90。一班学生超过90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教育本身变成了一种諷刺。”

維恩委员会說：“我們不論到什么地方，总是遇到这样一个問題：每所学校的兒童太多，每班的学生太多。”

教育不振的結果首先反映在文化程度上。印第安人中文盲占49.55%，印度人中为44.02%，而印度人约占英屬圭亞那人口的42%。尽管如此，政府却在1951年成立了尼柯尔委员会，着手寻求把趨向上昇的教育費用保持在目前水平上的途徑。換句話說，尼柯尔委员会的任务是縮減数目本来就很小的教育費用。

工人沒有办法享受中等教育，因为受中等教育是要付出書籍費、學費等等的。据教育部長說，“小学生中99%不能受到中等教育”。

1942年在英屬圭亞那調查生活費用的結果表明，中等家庭每星期平均收入中有14%（9便士）作为医药費。但医生的診費每次要2元（8先令4便士）到5元（1英鎊另10便士）。这意味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不得不到公立医院就医。可是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和设备十分缺乏。医疗程度和付款能力成正比。工人一般不是作为自費病人进医院的，而是作为“赤貧者”和“貧民”由医院收容。“貧民”要付一点錢，得到与“赤貧者”不同的照顧（？）——他們穿着自己的睡衣而不是公家的睡衣。

在佐洽教的公立医院，因为床位不足，有时病人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有床位的病人常常把自己的褥子讓給睡在地板上的病人，而自己則用被子来代替褥子。甚至在冬天和

下雨天,某些病人仍旧沒有被子。

本章中对英屬圭亞那工人經濟和社会狀況的分析,主要是依据曾在1942年調查居民生活水平的委员会所發表的报告。从1938年以来,生活費用不断上漲。比如,1942年的生活費用約比1938年高出60%。可是:

“毋庸置疑,开战以来生活水平已大大降低……而如果以1938年的生活水平为基数,則生活費用上漲的百分数將更大。”

根据英国殖民地部1951年度报告書中的資料(資料截止1951年为止),1951年的物价比1938年高出261%。

从1942年开始,政府員工不时加薪,但总是在实际工資猛烈下降、以致不得不考虑劳动人民的压力时加的。每一次,在准备把工資提高到接近生活費用的时候,政府总是設法使工資仅足以維持1938年和1942年的低微的生活水平。

虽然英屬圭亞那的生活費用几乎和英国一样高,但国营企業的工資很低,而私营企業的工資更低,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基本工人			临时工人		
	英鎊	先令	便士	英鎊	先令	便士
糖業: 种植园工人: 男工 女工	1	17	6	2	0	6
		16	7.5		18	5.5
	非熟練工人			熟練工人		
工厂工人: 男工 女工	2	0	1	2	19	0
		19	3			
鉄矾土开采業:	2	16	0	3	16	0

成衣業:						
佐治敦	2	7	6	3	3	9
其它地区	2	0	0	2	14	9
碼頭工人:	2	10	0	3	18	0
大米加工業:						
男工				2	7	3
女工	1	3	1			
国营企業:						
男工, 佐治敦	2	8	6			
农業地区	2	0	9			
女工, 佐治敦	1	15	9			
农業地区	1	10	6			

我国沒有关于疾病、退休、失業补助金的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險制度。貧民和失業工人每月只能領取一笔小得可憐的补助金——1.5元(6先令3便士)。

老年工人每月补助金在城市中为4.5元(18先令9便士),在乡村中为3.5元(14先令7便士),而且只發給65岁以上的老年工人。但是,要領到这笔补助金,还必须經過一番家計調查。如果申請者每月收入超过3.5元,他就不能領取补助金。

立法會議否決了关于廢止家計調查并把補助年齡規定为55岁以上的提案。而且虽然立法會議通过了修正案,決定把補助年齡規定为60岁以上,政府仍旧沒有批准。

目前,家計調查中的規定已經有了修改,申請者每月收入不超过10元时,得發給老年工人补助金。

而在这个时候,失業現象和犯罪行为不断增長。失業工人中有許多开始偷竊。警察費和監獄用費日益增加。1940年警察費为50万元,在1953年为180万元。

第五章 我們是怎样当选的

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已經起来进攻特权阶级的障地；他們正在組織起来为爭取長久以来被剥夺的权利而斗争。

——保罗·罗伯遜

我們升起了火，但堵住了烟窗。

——查尔斯·布勒

面临着經常的貧困、衰落、恐怖和流血，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团結精神日益增長。

糖業大王的統治使劳动人民不得不起来斗争，不得不組織起来。对劳动人民來說，糖不是甜的而是苦的。

正是在英屬圭亞那，在1922年成立了英帝国各殖民地国家中的第一个工会組織——“英屬圭亞那工人联合会”。后来在1931年世界經濟危机最緊張的时候，成立了“英屬圭亞那工人同盟”。到1939年，全国已經有10个工会。糖業工人参加了“英屬圭亞那工人同盟”和“劳动公民协会”。“英屬圭亞那工人联合会”在船塢工人中間有許多拥护者。1941年成立了“英屬圭亞那工会理事会”。我国所有的工会都参加了这个理事会。

起初企業主拒絕承認“劳动公民协会”，但工人的日益高昂的斗志迫使他們讓了步。那时他們就开始执行按种族

和行業來分裂工人的政策。他們把“工人同盟”認作工廠工人，主要是非洲工人的組織，而把“勞動公民協會”認作種植園工人，主要是印度工人的組織。

工會運動中的這種弱點到戰爭將結束時更為明顯。但是“工會理事會”力圖用統一某些工會並劃分另一些工會的方法來防止分裂。

1948年成立了“英屬圭亞那產業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很快便獲得廣大糖業工人群眾的支持。種植園主人拒絕與這個工會進行談判。糖業工人罷工次數大大增加了。

工人一直沒有得到過政治上的支持。全部政權都集中在甘蔗種植園主人及其他資本家的手里。19世紀整整100年內以及本世紀初，我國的政治實際上是種植園主人的寡頭政治。選舉權限制極嚴。在1910年，全國30萬人口中只有11,000人有投票權。享有這種權利的，主要是白種人和混血兒。非洲人和印度人遭到排斥，無法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但是在農業工人中，主要是在非洲移民中，受到教育並且昇到中間階層的人數愈來愈多。在這批新的知識分子中出現了許多政府機關的下級官吏和商業部門的下級職員。此外，這些知識分子中也出現了律師、醫生和其他自由職業者。也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堅決地要求進行憲法改革。

1928年曾進行憲法改革，成立了立法會議。它由29人組成，其中有10人是國家官吏。其餘19名議員中，14人是選出的，5人是總督任命的。這樣一來，民選議員便是少數。選舉權為收入資格和財產資格所嚴格限制。印度工人和非洲工人大多被剝奪投票權。

決定我國一切政策的行政會議，它的成分也能說明許

多問題。它由總督——行政會議主席、六名國家官吏和由總督在立法會議議員中任命(不是選出的)的其他六名委員組成。在總督任命的六名委員中，有兩名必須是立法會議的民選議員。

由此可見，憲法把我們的實際權力全部交給總督及其官吏的手里。

當時在小資產階級領袖影響下的自由黨要求使憲法進一步民主化。由於30年代加勒比美洲的經濟危機和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成立了一個皇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建議進行憲法改革並採取一系列的措施。

1943年，英國“頒賜”英屬圭亞那一部新憲法。我在這裡用“頒賜”一詞是經過考慮的，因為我們沒有直接參加制定這部憲法。憲法的頒布和廢止，全憑英國君主簽署的勅令。

根據新的憲法，立法會議應由14名民選議員、7名由總督任命的議員和3名官吏組成。但在戰爭的口實下，根據這部憲法應該進行的選舉被拖延到1947年11月。拖延的真正原因，是統治者害怕在當時席卷全國的風潮下對選舉權的嚴格限制會不起作用，結果進步領袖會當選。

因此立法會議的成分依然不變。但是在工人的壓力下，總督不得不任命“勞動公民協會”主席艾尤布·依東和“英屬圭亞那工人聯合會”總書記納·納·克里契羅為立法會議議員。

這一時期內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是由許多因素促成的。當時留學生和復員軍人紛紛回國。許多留學生是從美國回來的。他們在美國靠自己的努力進了學院和大學。復員軍人基本上都是工人和失業工人家庭出身的。不論是留

学生还是复員軍人，都充滿了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充滿了当时波及全世界的为爭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精神。

1943年底，我和我的妻子也回到了英屬圭亞那。我的妻子曾經積極參加底特律大学和怀恩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我在美国度过的七年，是我的政治覺醒时期。我在華盛頓的霍华德大学學習的兩年中，曾嚐过种族歧視的滋味。我开始注意印度的独立斗争。在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的自傳“通往自由之路”一書中，我汲取了政治思想。我在芝加哥西北大学附屬牙医学校求学时，抽時間在夜校和暑期学校中學習了政治經濟学、社会学、哲学和政治学。我和我的妻子跟別人一样，投入了斗争。起初我們的参加斗争，只是就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向报章杂志投稿和写信。1945年，我当选为“劳动公民协会”的司庫。1946年，我和其他四位同志，其中包括当时任“英屬圭亞那工会理事会”書記的杰·姆·哈巴德，一起組織了政治事务委员会。我們出版了免費發送的“政治事务委员会”每月公报。这份公报不久便引起了种植园主人的憎恨。他們向立法會議求援，有一次甚至告到英国下院，坚决要求封閉我們的公报。

一年后，成立了“妇女經濟与政治組織”。这一組織的領導者是溫弗雷德·加斯金和我的妻子簡奈特·賈根。該組織的任务之一，是宣傳妇女应有广泛的投票权。在1953年选举前，許多沒有收入也沒有恒产的家庭主妇以及每月工資低于十元的女佣都被剝夺投票权。

根据1943年的宪法，在1947年第一次举行了普选。我国当时沒有真正的政党。20年代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政党自由党当时已經停止活动了。为了选举，自由党特地重新組織起来，但选举后不久便告解体。

为了阻撓我国日益發展的工人运动，成立了两个种族团体，一个是吸收印度人中反动分子参加的“东印度协会”，另一个是由非洲人組成的“有色人种同盟”。这两个团体都竭力煽起我国两个最重要的种族之間的民族仇恨。

英国人奉行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即“分而治之”的政策。他們从荷蘭人那里汲取了許多經驗。在奴隶制度和奴隶起义时代，荷蘭人曾利用印第安人当警察，讓他們捕捉逃亡的奴隶。这一点曾載于瓦丁頓制宪委员会的报告。該报告指出，“印第安人組成的警察或民警部队成为国家机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某一位荷蘭总督“由于和印第安部落，尤其是和好战的卡利勃部落紧密合作而得以击退西班牙人的侵犯，得以把奴隶的起义鎮压下去，从而平定了殖民地”。

奴隶制度廢除后，由于种植园的需要，运来了許多印度人。他們的工資要比非洲人所要求的低1/2到2/3。

由此可見，远在那个时候这两个种族就已經开始敌視。許多被解放了的非洲奴隶在种植园附近建立了自己的乡村。其中較富裕的人受到了教育并上昇为知識分子，另一些人成为下級官吏。比較不走运的人当上了警察或服其它公役。公務員這項職業几乎为非洲人所独占，当然有若干最重要的行政职位例外。这些职位是專門保留給欧洲人的。

从英国人成为英屬圭亞那的主人时起，非洲人便成为“国家机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次在恩穆尔、魯姆維尔德或在列昂諾拉等地的甘蔗种植园屠杀工人时，向印度工人开槍的总是非洲警察。

种族主义政客的手段是非常簡單的。

印度政客告訴印度工人，說只有他們能使政府把目前

專門委之于非洲人的国家机关工作給印度工人。但是，这些印度政客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他們选入立法會議。他們为爭取普遍的选举权而进行宣傳，因为当时除財產資格和收入資格外，还有教育資格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印度人的投票权遭到剝夺，其原因是英屬圭亞那的印度人中約有40%是文盲。

在这个意义上，印度政客是进步的。但他們沒有再更进一步。其中許多人和非洲小資產階級人士一样，不去設法为那些願意提名他們候选的人爭取廢除財產資格(500元)或收入資格(每月100元)。

另一方面，非洲人中的領導人士竭力企圖保持他們在国家机关中的关键性障地。这些人的武器是恐惧的情緒。他們告訴非洲人，說印度人不但已成为大地主、大資本家，而且充斥于自由職業中，如果非洲人不互相支持，那他們很快就会丧失剩下的唯一的東西，即自己的工作。他們反对廢除教育資格，因为非洲人几乎100%是識字的。

由于这一切，工人运动中沒有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缺乏統一和正确的領導。

1947年选举后不久，我当时是立法會議的議員，認識到必須把全国所有进步人士团結到一个政党内，而这个政党必須执行階級政策而不是种族政策，并且要代表一切劳动者提出反对种植园主人和資本家的政綱。

1950年1月，在我們于1946年为爭取宪法改革及其他改革而組織的“政治事务委員會”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进步党。它团結了英屬圭亞那的一切种族并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活动。

1950年，英国工党政府派瓦丁頓委員會到英屬圭亞

那。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就地研究局势并就修改宪法提出建議，因为当时已經不能繼續对圭亞那人民的日益坚决的要求置之不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前英屬圭亞那总督約翰·瓦丁頓，其他两个成員是維·哈勞教授和里达·兴頓博士。

瓦丁頓委员会建議廢除教育程度資格、財產資格和收入資格，实施普遍的选举权，立法机关采取兩院制：下院（众議院）和上院（參議院）。

根据該委员会的建議，众院应由24名民选議員和3名官方議員組成；而參院应由9名議員組成：6名由总督直接任命，3名由总督根据众院中的多数党和少数党的提名任命，其中2名由多数党提名，1名由少数党提名。

一切政策問題由行政會議決定。行政會議主席由总督兼任，共有10名委員：6名民选部長、3名由总督任命的部長和1名由上院选出的委員。3名由总督任命的部長主持最重要的部：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国防和警务，新聞和广播，司法、公安和財政。

我們的政党从剛成立的时候起，就反对瓦丁頓提出的宪法。1951年末第一次公布瓦丁頓的报告时，我曾在倫敦举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指出这部宪法的弱点并揭發其中各种局限性和妥协性，而瓦丁頓委员会却認為这些限制“是从西方文明观点看来为民主政府所不可或缺的主要特征”。在我国的宪法中，局限性的成分远多于妥协性。把我国的宪法和美国的宪法比較一下，不是沒有意义的。

在美国，參議員是选举的而不是任命的；在我国，參議員是任命的，而且下院通过的法案，參議院有权拖延一年。美国的总统是由人民选举的，而我国的总督是由英国女王

通过殖民大臣任命的。在美国，只要有参众两院联席会议2/3的票数，就可宣布总统的否决无效；而在英属圭亚那，总督的否决是绝对有效的。

此外，总督具有批准权。“为了公共信仰，为了公共秩序和正确的治理，”总督不但能把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加以否决，而且还能宣布为立法机关所否决的任何法案通过。同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如国防、税收、对外关系和宪法问题等等，都是由英国女王政府掌握的。

瓦丁顿宪法中的种种限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保持现状，捍卫英国政府（它需要大量原料以便弥补美元荒）的帝国主义利益，保护英属圭亚那境内的资本家及其利润。

关于这一点，瓦丁顿委员会的报告中不止一次地、明明白白地说道：

“……要发展经济，必须进一步吸收国家和私人的投资。如果我们希望得到这些资金，就不能采取任何足以破坏投资者的信任的措施。……我们必须使投资者不担心会有某种激烈的行动来损害他们的企业或有考虑未周的税赋来妨碍合法的投资。”

又据约翰·瓦丁顿爵士说：

“……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是发展经济。为此，必须吸收大量的海外投资并须在一切事情上完全信任政府。”

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经济结构是不会有有多大改变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准备使1948年伊文思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的“经济不景气状态”继续下去，那末就必须改变经济结构，即尽可能地实现糖业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制订全面发展的农业计划，等等。

我們想不出为什么我們的宪法不能連至少像我們的鄰邦荷屬圭亞那的宪法那样民主。荷屬圭亞那的宪法沒有我們的宪法的那些缺点。荷屬圭亞那的政府只向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負責。他們的參議員不是由总督任命的，而且总督也不參加內閣。而行政會議的成員完全是在立法會議民選議員中产生的。荷屬圭亞那除国防和对外关系外，在一切問題上享有完全的自治权。

尽管我們反抗(我是上届立法會議中唯一反对瓦丁頓宪法的人)，这部宪法还是从1953年3月1日开始生效。1953年4月举行了以普选权为基础的第一次普选。

我們的党有明确的政綱。我們的政策是正直坦白而合乎宪法的。我們和英国的工党一样，竭力为我国的劳动人民爭取实施社会主义新政。下面簡短地談一下我們政綱中的主要几点。

在社会問題上，我們的政綱中建議举办社会保險，实施免費医疗，發付工人職業病賠償金，在最短期間实施工厂法。

在教育問題上，我們爭取由国家監督教育并爭取教育与教会分离(269所得到国家帮助的小学中有252所是由各教派控制的)。我們同意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我們要求在中学增加獎学金名額，要求开办更多的幼兒園。

在农業問題上，我們建議进行土地改革和土地整理，建議授与农民土地使用权并發放农業貸款。我們要求实行統一筹划的排水与灌溉制度来代替只对种植园主人有利的現行制度，以便开发大片荒地。

在住宅建設問題上，我們要求建筑房租低廉的住宅。

在国家行政問題上，我們要求改变农業政策，授与人民

以普选权，更好地监督公共工程部的撥款并調查該部的工作。

在財政問題上，我們要求增加直接稅，降低間接稅。

最后，在工業問題上，我們要求建立新的工業部門。

我們打算修正一切限制人民自由行動权的現行法律和条例(根据这些法律和条例，可以任意禁售某些書籍，禁映某些影片，宣布某些人士不受法律保护)。我們也打算推行保护工会的法律，取消关于行業糾紛的法令(該項法令赋予政府以禁止“生活必需”企業部門中工人罢工的权力)，实施以美国华格納法为基础的、关于承認工会的法律。这一切，作为我們对人民的号召的一部分，在我們的竞选綱領中講得都很明白。

在选举时期內，我們的对手在出版界、教会和广播电台的帮助下向我們进行了惡毒的挑衅。他們采用了經常慣用的卑鄙手段，發出了关于国际陰謀、强迫劳动營、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胡乱叫囂。这本来也是在意料中的。

这一次向我們挑衅中的主要角色是報紙。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紀事日报”、“商船日报”和“圭亞那新聞报”这三家日报都是由糖業公司、礦業公司、貿易公司和銀行的代理人兼營的。

选举前不久，上述三报的星期日刊有兩次附有四張由“劳动公民协会”編輯出版的副頁。这一个經濟相当困难的工会居然能湊得起錢来干出版副頁这样糜費錢財的事情，这倒真是令人吃惊！这个工会这次攻击的主要对象是人民进步党。

这次选举除我們的党外，还有其它三个党派和許多無党派人士参加。

我們对手的立場就是仇恨象征着人民运动的人民进步党。某些对手沒有明确的政策，甚至不想提出一个政綱来。另一些对手从我們的政綱中剽窃了許多东西，但是他們当然并不准备把这些东西付諸实现。

我国一切党派都勾結起来反对我們的党。在竞选运动中支持它們的还有教会。当时曾使用以往慣用的宣傳伎倆：說我們人民进步党会沒收居民的土地，燒掉教堂，把一切私有财产和积蓄都充公，甚至会拆散家庭。

这些党派造謠說，我們从莫斯科領取“紅色的金子”。事实上，我們在竞选运动期間的預算是很小的（我們甚至不得不借了錢来替某些候选人交納保証金）。在选举那天，我們候选人之中有許多人沒有扩音机。許多人不得不騎着自行車从一个群众大会赶到另一个群众大会，有些人甚至是步行去的，因為他們沒有錢雇汽車。

要明白教会到底为什么支持現存制度，这是很容易的：許多教会本身就是某些企業的股东，另一些教会則是种植园主人出錢維持的。不久以前，“聖公会”从“波克兄弟公司”那里領到55,000元教堂建筑費。最惡毒的反动分子是葡萄牙教士。他們是天主教的台柱。比如，当制宪委员会来到英屬圭亞那的时候，葡萄牙教士曾通过“聖灵之劍”这一团体进行反对普选权的活動。

选举过程中，平靜無事。警察局長事先曾把义勇軍調作后备部队，以便在一旦發生騷乱时使用，但連他也說他以前从来沒有看到过秩序这样良好的选举。

我們得到了24席中的18席，国家民主党得到2席，还有4席为無党派人士所得。我們有6个候选人遭到失敗，这6人中大多数是在偏僻地区竞选的，而我們由于經濟困难不能

在这些地区进行竞选活动。

我们以绝对多数票当选后，便获得全部6个民选部长职位。1953年5月28日，总督把部长职位分派给我们。6月中旬，当英国女王加冕典礼庆祝活动结束后，我们便开始办公。

当我们的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当我们正在实施新的法律、正在履行竞选诺言的时候，英军却开到英属圭亚那来了，我们的很不完备的宪法被废除了。

第六章 借口找到了

我們制造了多么錯綜复杂的糾葛，
當我們开始欺騙的時候。

——華爾特·司各脫

就这样，宪法被廢除了。这一次沒有一般常有的那种前奏曲。既沒有槍击，也沒有毆打，更沒有恐怖活动。但是总得找一个借口。最合适的是关于共产主义的鬼話。因此又拿出在这种場合常用的借口——“紅色陰謀”。

英国政府無法把任何一种明确的罪名加在我們头上，只能說“可能”、“大概”、“或許”。英国政府最初發表的、为調动海陸軍这一行为辯护的声明中說到“共产党人及其同謀者(其中某些人窃据部長职位)的陰謀”，但是沒有办法說得更明确些。

声明接着說道：

“如果对此不加制止，他們將企圖采用某些国家曾經采用的方法来建立共产主义專制国家。这將导致流血……”

可是要使人相信“紅色陰謀”的神話不是很容易的。虽然“每日快报”在10月5日以它一向用慣的那种自以为是的語調，說到“共产党人企圖夺取英屬圭亞那的政权并把該殖民地变成赤色国家的陰謀，以及为制止这种陰謀而已經采取的戏剧性的第一步”，但是比較慎重的報紙都要求政府拿

出更有力的証据。比如，“泰晤士报”說道：“謹慎的觀察家們認為：如果在这次炫耀武力后不能揭露真正的陰謀，則社會輿論將會反对这些行动。”10月11日的“觀察家报”指責英国政府“大大的失策”并“犯了严重的錯誤”。

但是就廢除我国宪法發表的白皮書并未提供任何証据。“泰晤士报”在10月21日指出，“白皮書並沒有像我国許多人所期待的那样充分而明确地揭露共产党的陰謀。”过了几天，在英国下院討論了英屬圭亞那問題后，“經濟学家”杂志承認，“白皮書沒有打消許多人的怀疑”。

白皮書加在我們头上的主要罪狀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白皮書說我們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煽动罢工，說我們企圖用实施某些法律的方法来消灭現有的工会。

为什么白皮書指責我們煽动罢工，这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不久以前，在4月的选举中，我們获得国会24席中的18席，这样一来，我們在国会中占了绝对多数，已經有条件实现我們的計劃，因此，就是假設我們曾經想采取罢工的手段，現在也沒有这种必要。

白皮書說我們企圖实施一些法律来消灭現有的工会。它所說的現有的工会，是指得到甘蔗种植园主人承認的“劳动公民协会”（种植园主人承認它是工人的談判代表）。据白皮書說，参加这个工会的工人数目为8,272人，而参加沒有得到种植园主人承認的“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人仅为817人。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是我們强要企業主承認一个不得到工人支持的工会似的。

我們的劳工关系法案中，並沒有規定企業主必須承認“英屬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或其它任何一个工会。劳工关系法案仅賦与劳工部長批准任何一个产业部門进行表决

的权力，只要該产业部門以前沒有已得到企業主承認的工会，或有几个为充当工人談判代表而互相斗争的工会。如果以前沒有已得到企業主承認的工会，那末在劳工部所进行的工人表决中获得全票数51%的任何一个工会必須得到企業主的承認。如果有几个互相斗争的工会，那末与已得到企業主承認的工会竞争的工会必須获得全部票数的65%以上。由此可见，我們的法案甚至比美国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还温和；根据美国的劳工关系法，这种工会只需要获得51%的微弱多数。

假如白皮書里的數字是可靠的話，“劳动公民协会”就不必怕任何表决：只要获得36%的票数就行了。

但是白皮書中的統計数字是編造的。这些数字像白皮書中其它資料一样，都是伪造的，而且伪造的痕跡非常明显。

首先，参加“劳动公民协会”的不但有糖業工人，而且有其他許多产业部門的工人。固然它的會員大多是糖業工人。可是我們必須記得，这个工会曾經和甘蔗种植园主人簽訂所謂“援助計劃”（这个計劃用来代替維恩委員會所提出而为种植园主人以經濟困难的借口拒絕的补助金制度）。工人要享受这个計劃中規定的各种优待，就必須成为“劳动公民协会”的會員。我还要指出，企業主欣然代这个工会从工人的工資中扣去会費。

白皮書断定“英屬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會員人数为817人，但殖民地部1950年度报告說是3000人。为什么这个工会的會員数目如此急剧地减少，为什么在1950年會員数目本来可以达到三万人的时候仍只3000人——要明白这一点，就必須知道甘蔗种植园內的情况。

工会积极分子被禁止进入种植园。参加“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常常被赶出自己的住所。在全失业或半失业的条件下，工人在生活中充满了恐惧情绪。企业主利用各种借口来拒绝雇佣工会积极分子。结果，许多本来拥护这个工会的工人就害怕当它的会员。

选举结果是极能说服人的。“劳动公民协会”在1953年的普选中支持国家民主党。这个协会的主席赖昂纳尔·拉库同时又是国家民主党的副主席；“劳动公民协会”的书记和副主席都被国家民主党提名为候选人。但宣布选举结果时，发现国家民主党才获得两席，而且这两席还不是在糖业工人占选民多数的选区中获得的。

另一方面，“圭亚那产业工人联合会”支持我们的党。在全国24个选区中，有9个是糖业区。我们在这9个糖业区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两个工会的会员数目根本不能说明它们在工人中间的影响。事实上，在糖业和铁矾土开采业工人占选民人数70%到80%的伯比斯河选区，“劳动公民协会”的书记不但把议席输给“圭亚那产业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而且还损失了保证金。

英国议员伊恩·米卡多在1953年11月27日发表于“论坛”周报的文章中，关于“劳动公民协会”这个所谓的工会这样写道：

“在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的面前放着一份杂志，叫做‘劳工拥护者’，它自称为‘劳动公民协会正式机关刊物’。这份杂志是1953年10月18日出版的，是宣布废除英属圭亚那的宪法后出版的第一期。

这家杂志的社论赤裸裸地公开保衛两种东西：整个资

本主义以及——具体地說——殖民地資本家。

杂志上沒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英屬圭亞那工人的低微的工資和艰苦不堪的生活条件。根据这家杂志的社論来判断，‘劳动公民协会’的會員得到很高的工資，他們的生活条件極其理想，而这都是由于空前慷慨、乐善好施的雇主的恩惠。

資本主义被說成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不断扩展的体系’，是一种‘大胆的、富有想像力的社会形式’。社論向主子大献其媚，甚至無耻到把奴隶制的廢除归功于他們（事实上正相反，他們曾經竭力反对），恭維他們关心企業中的劳动保护（事实上他們从来不曾为劳动保护而自願拿出一文錢），恭維他們‘几乎廢除了女工和童工制度’（事实上他們竭力企圖保持这些制度）。

但是‘劳动公民协会’这份正式机关刊物中最炫目的还不是文章，而是广告。

这份工会杂志中有146欄文章和94欄雇主的广告。封底完全登滿广告。是誰的广告呢？你当然会知道——是‘波克兄弟公司’的广告。誰出錢維持这份杂志不是很清楚嗎！

任何一个工会的會員，当他在一天早晨收到自己所屬的工会的杂志、看到它以40%的篇幅登載了他的雇主的广告的时候，不知作何想法！

可是英国职工大会的領袖却号召自己的會員支持‘劳动公民协会’这个黄色工会。”

在这份杂志中占半頁或1/3頁地位的其它广告，是由其它大公司出錢刊登的，例如：“桑德巴赫·帕克公司”（这家商行和达木拉拉公司有密切关系）、“史普罗司东斯公司”（达木拉拉铁矾土公司的联号）、“达木拉拉电力公司”和“达木

拉拉烟草公司”(美国某一烟草托辣斯的分号)。

第二，白皮書指責我們企圖控制国家机关。在英屬圭亞那，所有重要的职务都由英国派来的官吏担任，例外的很少。我們在竞选运动期間曾提出一个口号，即要求在一切职务上优先录用合乎条件的圭亞那人。

高級官吏在口头上支持这个政策，但在事实上却出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而拼命阻止这个政策的实施。我們的立場在英国政府的白皮書中遭到了粗暴的歪曲。

我們必須記得这样一个事实：在英国，国家公務人員总是和执掌政权的政府合作的，可是在圭亞那，总督和高級官吏本身就是政府，他們总是根据糖業、礦業和商業公司的利益来治理国家。在这一次使我們得到政权的选举前，他們一直反对我們。选举后，他們不但被任命入閣，而且还被安插到我們管理的部里。他們之中有些人公开反对我們。我們所希望达到的，是已故的拉斯基教授所說的、英国終身文官制度和美国党派文官制度這兩者的优点的“結合”。

我們可以举出無数的例子来証明我国的官吏对种植园主人和其他資本家的利益照顧得無微不至。

譬如在1921年，政府向达木拉拉鐵道公司賒購廢置不用的鐵路器材和資產。合同上規定每年付款84,000元。到現在已經30多个年头了，我們却还在付款，而且看来我們永远要付下去。

不久以前，政府用48万元向“波克兄弟—麦克康尼尔公司”买了在坎貝尔維尔的252英亩土地。这个价錢比1937年当地地价貴了95倍：当时3000英亩土地的买价是六万元。根据政府和該公司的協議，公司發行了48万元債券，年利三分半。單这一点，就使該公司每年从252英亩土地上收入

16,800元；而1938、1939和1940這三年內該公司所有土地的每年全部收益不超過一萬元。

白皮書加在我們头上的第三條主要罪狀，是我們企圖唆使警察背叛政府，用恫吓和暴力的手段組織民警，並在英屬圭亞那建立一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

白皮書引用了據說是我在5月3日所說的話：

“同志們！以前當我們乞討麵包的時候，我們得到的是槍彈，那些槍殺工人的人受到我們主人的寵愛。但是人民進步黨一旦執政，那些以前用來屠殺窮人的子彈將用來對付我們的壓迫者。我們要建立警察部隊。這個部隊將叫做人民警察部隊。”

在以前，警察是壓迫工人的工具。糖業工人曾經在列昂諾拉和魯姆維爾德的種植園以及1948年在恩穆爾的種植園遭到屠殺。政府恩穆爾事件調查委員會指出：

“但是我們認為，證據證明：在最初發出的幾槍後，已不必射擊，因為普蘭和其他幾名工人是在已經跑開的時候遭到槍擊的。”

普蘭和其他四名工人被殺，若干人受重傷。但是對這次槍擊應當負責的軍官，政府不但不加以處分，反而授給獎章。

我們確實需要一個能維持法律和秩序的、無所偏袒的警察當局。但是我從來沒有說過，“我們要建立警察部隊。這個部隊將叫做人民警察部隊”。事實上，我說的是：“我們需要人民警察。”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已經在選舉中得到了絕大多數的選票，而且我當時已經完全明白：根據我國的新憲法，警察部隊將由總督秘書長統轄而不是由民選部長指揮。總督是武裝部隊總司令。在這樣的條件下，關於

組織人民警察部队的問題，我們当然連想都不可能想。

英屬圭亞那勞工部長阿什頓·蔡斯被白皮書加上干涉警政的罪名。白皮書硬說他說過这样的话：

“只要有地方發生勞資糾紛，工人和雇主發生沖突，警察立即就出來干涉。这种情况實在可恨……以後警察再採取这样的行動，一定會遭到民選部長們的堅決的反擊。”

我們的部長，尤其是公共工程部長和勞工部長，的確在行政會議提出過警察非法干涉勞資糾紛的問題。有一次在魯悉南種植園，在勞工部檢查員詢問某些工人的時候，警察記下了這些工人的名字。這張名單以後必然落到了種植園主人的手里。勞工部長認為这样的政策是不能容忍的。他的這種看法是正確的。

白皮書中有一章談英屬圭亞那境內的所謂暴力威脅。這裡又引用了據說是我說的話。白皮書指責我在5月10日作了一次叛變性的演說，指責我在這次演說中發表了下列言論：

“在怯尼亞，非洲人不但殺死搶去他們土地的白人，而且還殺死本國的叛徒。我們也必須这样對付那些保衛政府的利益而對人民漠不關心的叛徒。”

第一，我不會說過“必須”，而是說“本來可能”。第二，白皮書當然是斷章取義。整個來說，這次演說是勸導并警告那些企圖越來越多地剝奪人民權利的人。上屆立法會議會通過一項法案，決定授與總督以禁止某些書籍、影片和唱片進口的權力，并授與郵政總長以檢查私人信件的權力。我這次演說就是在這項法案通過後不久發表的。

許多人的自由行動權受到了限制。比如，圭亞那產業工人聯合會主席杰·普·拉奇曼辛格博士兩次被控擅自進入

种植园。而我則被控“非法”訪問我自己的选区，并被罰1,000英鎊。我和我妻子被特立尼达島和利华德群島政府禁止入境。我已經說过，加勒比美洲杰出的工会領袖和政界領袖被禁止进入我国。我从美国訂購的小冊子和書籍被当局沒收，付之一炬。

白皮書硬說教育部長曾經于9月11日在众議院說过这样的話：

“如果真是廢除我国現行宪法，……我們將以全力来反对。”

可是白皮書故意漏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六个字。我国宪法廢除后，我們的反抗只是不合作和拒絕使用暴力。必須指出，这段話是教育部長在众議院回答反对党領袖的發言时說的。这位反对党領袖在几个星期前就曾恐吓我們（他所知道的政府秘密显然比我們更多），說女王政府即將廢除我国宪法。

白皮書还断章取义地摘引了据說是教育部長于9月24日在群众大会上發表的演說。实际上，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做报告的是劳工部長。白皮書所摘引的話如下：

“他們說他們將廢除我們的宪法，但是我希望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企圖这样做的话，仁慈的女王陛下將不但听到从澳大利亞偏僻地区發出的原子炸彈爆炸的声音，而且还將听到英屬圭亞那的沼澤發出的原子炸彈爆炸的声音，因为我們要反抗到底。我不准备在这里談論我們的行动計劃。在实现这个計劃的时机尚未到来之前，我是要保密的。”

这些話也是在謠傳我国宪法將被廢除以后說的。这篇演說里其实只是些政治上的修飾用語（以后我們所采取的拒絕采用暴力这个政策也証明了这一点）。但英国殖民地部

却認為这篇演說足以構成严重的罪狀。

縱火也是白皮書中列出的最重大的罪狀之一。而“每日快报”又把这条罪狀夸張渲染到了頂点。白皮書声称,根据“可靠的情报”已可确定我們企圖在佐治敦燒掉企業,燒掉富有欧洲人和政府官員的私邸。

这倒真是一个極严重的罪名,所以我們要求政府通过法律程序搞清这件事。当在英国下院有人向殖民大臣奧利佛·李特尔頓提出質問,問他为什么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的时候,他露了馬脚,承認所謂“可靠的情报”原来是警察局的密探提供的。所謂我們的縱火計劃是白皮書中明确提出的几个罪狀之一。它当时是廢除我国宪法并黜免部長的一个主要借口。

但是在英国下院辯論时,霍普金遜先生对芬納·布罗克威先生所作的答复中透露,这个計劃是在10月7日,即英国女王于10月4日簽署廢除我国宪法的勅令以后三天“制訂”的。換句話說,根据英国政府的說法,我們的“火燒佐治敦”的計劃是在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来防止这个計劃实现之后制訂的。事实上在佐治敦一次縱火案也沒有發生过,这一点我們也不必多說了。这样看来,李特尔頓先生比戈培尔和希特勒更胜一筹,因为戈培尔和希特勒畢竟还是先燒了国会再誣賴共产党人的。

白皮書中还說到据說是人民进步党領袖們制訂的“暴力計劃”。白皮書中說道:

“1953年9月24日,……人民进步党和‘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領袖們指使一大群人拥到立法會議大楼前。当警察喝止这群人的时候,公共工程部長却号召他們冲进大楼。”

这里是指在众議院討論劳工关系法案时的情形。白皮書說公共工程部長号召群众冲进大楼，这种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事实是这样的：1953年4月选举后，人民对政治表现出極大的关心；对許多人說来，出席議會旁听已經成了一种習慣。但是旁听席座位太少；以前是席上無人，現在則是座無虛席。

白皮書还說人民进步党建立了非常發达的小組体系，并說人民进步党“拥有一个由400到500名黨員組成的核心；这些黨員准备着按照他們領袖的、尤其是金先生的命令去进行暴力活动”。請你們注意“准备着”这三个字。英国政府之所以只能說这三个字，是因为它举不出一个足以說明我們曾采用暴力的实际例子。英国政府用“小組”这两个字，是为了要把人民进步党污蔑一番。但是我們的党是在和英国工党相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白皮書第八节里列了兩条“严重的”罪狀：一是我們廢除了禁止西印度居民进入英屬圭亞那境內的法律；二是我們通过了一項法案，决定廢除一般称为顛复性書籍法案的禁書法令。

1952年，英屬圭亞那总督禁止下列六位西印度著名政界領袖和工会領袖入境：“牙买加职工大会”前任副主席兼人民民族党执行委员会委員理查德·哈特；“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牙买加工会联合会”主席斐迪南德·史密斯；特立尼达与托巴戈独立党書記約翰·拉·罗斯；“国际工会”書記兼“特立尼达职工大会”書記昆丁·奧康諾尔；特立尼达最大的工会——“石油工人工会”的主席兼“特立尼达职工大会”主席約翰·罗哈斯；“加勒比劳工大会”倫敦分会書記比利·斯特拉詹。

斯特拉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志願从軍，在英国皇家空軍某轟炸机大队服务；他曾經在德国上空受重伤。他当时是为了拯救世界上的民主和四大自由而战斗的！

人民进步党捍衛英屬圭亞那一切民族、尤其是西印度各族人民的来往自由。我們政綱的第二条要求圭亞那和西印度成立联邦，并且其中每一成員国实行充分的內部自治。我們不明白，为什么我国的大門要对帝国主义强盜敞開，而对西印度的爱国者，不論他們是信仰共产主义还是具有其它任何政治信仰，則一定要关闭。

这里所說到的禁令都是違反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个人来往自由的原則的。

白皮書說我們企圖廢除授权政府禁止書籍和影片进口以及拆閱私人信件的法律，对这一点我們不准备作一番辯护。我們的确希望廢除这条法律。每一个珍視自由的人都会在这一点上支持我們。

1953年3月，上届立法会議忽忽忙忙地通过了一条法律，授权总督决定哪些書籍、影片和唱片可以进口。在这以前几个月，总督曾沒收几綑自英国进口的書籍，并下令燒掉。这違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这一条說：

“人人都享有言論自由的权利，人人得自由發表自己的主張。这一权利包括不受任何干涉地保持自己主張的自由，包括不受国界的限制而以任何手段寻求并获得情报和思想的自由。”

当英国政府在欧洲委员会中同意人权公約的时候，大家以为所有这些权利都将适用于我們。

西印度群島大主教兼英屬圭亞那大主教，是不能把他叫做人民进步党的朋友的。李特尔頓在英国下院辯論英屬

圭亞那問題的時候，也正是向他求援的。但是在我們上院討論撤銷禁書法令的動議時，這位兼任上院議員的大主教說道：

“我以前認為、現在還是認為這項法令是無益的、不適時的、不受人歡迎的，而且一般說來是有害的。從這項法令剛以法案的形式出現的時候起，我就一直堅決反對它；我如今有機會說出我對於撤銷這項法令的意見，很是感謝。這項法令侵犯了個人自由。它不僅僅是限制了人權。如果說絕對自由意味着無政府主義，那這項法令就意味着絕對的暴政。

我今天有機會熱烈地擁護撤銷這項可惡的法令的動議，感到很滿意；這項法令必須永遠地從殖民地法規大全上刪掉，並且永遠不再出現。”

白皮書中對於我們和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聯繫說了很多。當然，人民進步黨的某些領袖曾經到過東歐，參加過各種會議。但是難道這就犯了罪嗎？如果這樣就算犯罪的話，那我們的自由也太好了，連一點民主的氣味都沒有了。英國許多知名人士——議會議員、企業家、宗教界人士等也到過東歐。可是他們到底因為訪問東歐而認罪了沒有？當然沒有。而且他們又為什麼要認罪呢？我們也是如此，決不認錯。

人民進步黨團結着一切為英屬圭亞那的獨立和自由、為英屬圭亞那人民社會和經濟福利而鬥爭的進步人士。我們和其它某些民族主義政黨不一樣，對黨員的思想觀點並不重視，只要求黨員忠實於黨的政綱，而且我們也不去問黨員的信仰如何。在這一點上，我們比總督及其朋友寬容得多。

白皮書提到悉尼·金和阿·韋斯特馬斯曾出席世界和平大會。但人民進步黨絕不認為參加和平運動是共產黨人的特權。世界各地許多不是共產黨員的人也參加了這個組織。

我們這些殖民地國家的人民懂得，假如不採取措施來發展經濟，我們的生活水平會一直很低。大筆款項用於武器和軍備。只要把這筆款項的零頭用於像英屬圭亞那之類的落後地區的建設工程，這些地區人民的生活就會很快地改變。

我們看不出世界和平理事會布達佩斯會議的世界和平理事會宣言中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這個宣言說：

“很大的希望已經出現了。現在每個人都看到協議是可能的。屠殺能夠結束。‘冷戰’能夠制止。

在這個時刻，我們莊嚴地號召各國人民要求他們的政府進行協商並達成協議。

我們大家有責任支持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每一個行動，不管這種行動可能來自那個政府。我們有責任挫敗那些阻撓並拖延協議的人的活動。

我們有能力實現和平，我們有責任來贏得和平。”

白皮書說到我曾經參加1951年在柏林舉行的世界青年聯歡節。這件事，英國殖民地部當時是知道的。但我回到倫敦後，殖民地部仍舊為我安排了一次旅行，讓我到蘇格蘭去參觀。關於這一點，白皮書里當然沒有提起。可能當時他們以為我和其他許多殖民地政客一樣，是可以收買的。

最後，白皮書極其嚴厲地指責我們，說我們企圖破壞童子軍組織的地位和影響！

我們希望糾正教科書里不正確的言論，因為這些教科書歌頌英帝國，讚美克來武和華倫·哈斯丁斯*，認為這兩人是真正的愛國者。我們這種希望被英國政府用來證明我們有共產主義企圖。但是，要是共產黨人有這樣一種願望，所有民主人士就會在這一點上支持他們。我們還希望取消通過教會和政府來實現的對學校的階級監督。對這一願望，白皮書也採取了與以上相同的態度。可是真湊巧，許多年以前西印度殖民地開發及福利局教育問題專員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白皮書的全部內容似乎可以用“新政治家與民族”雜誌在1953年10月24日所說的話總結如下：

“只要舉出一兩件事情，就可以駁倒白皮書的論據。如果陰謀并煽動採取暴力等罪狀有些根據的話，就應該把這個事件交給司法機關，讓司法機關公開審理提出的證據。對於無力治理和‘邪惡的聯繫’等罪狀，克利契·瓊斯在上周本刊上答復得好。他說：殖民地發展到一定階段，就要給該殖民地人民以自治的權利，而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總是有些冒險的。”

* 羅伯特·克來武（1725—177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最著名的活動家，英國資本主義侵略印度時期內最殘酷的殖民主義者之一，他採用最貪婪最無恥的手段；華倫·哈斯丁斯（1732—1818年），克來武的門生和繼承者，英國第一任印度總督，在職十餘年。——俄譯注

第七章 言与行

哪怕你們成千成万地从海外涌来，
哪怕你們像蝗虫一样充塞了街道，
哪怕你們把手槍抵住我的胸膛，
我还是要举起拳头，
唱自由之歌。

——馬丁·卡特

今天，街上一傳出要求独立的呼声，就有無數的声音响应。过了十来天，这个呼声就傳遍了全國，甚至妇孺也毫無恐惧地把它牢記在心头……虽然你們杀死所有那些起来反抗你們的人，你們可以强使人們閉口不言，但决不能改变他們的心。每一个人都已經把“独立”这两个字刻在他的心上，無數人在他們居室的寂靜中說出这两个字。你們能把他們都逮捕和杀死嗎？

金允植和李淵稷（譯音）

英国議會是从1953年10月22日开始辯論英屬圭亞那問題的。我在旁听席上听了女王政府閣員和反对党議員的發言。

英國的报章杂志事先为李特尔頓先生的發言打下了底子。除“工人日报”外（这家报纸說：“英国向英屬圭亞那宣战了”），所有报纸都采用了聳人听闻的标题。譬如，“簡奈

特是仇英主义者。对英国的仇恨是賈根夫人一切行动的出發点”(“每日鏡报”，10月5日)；“旨在擷取英屬圭亞那的陰謀。艦隊正在迅速运送軍隊”(“每日郵报”，10月7日)；“圭亞那境內的陰謀暴露。武裝部隊將防止圭亞那發生赤色政變”(“新聞紀事报”，10月7日)；“英國人家貯備武器。總督被嚇。亂民向反共議員的領導者投擲石子。種植園主人的妻子接到離開種植園的建議”(“每日快報”，10月6日)。

開始辯論前一日，報紙上的標題更是怵目驚心。10月21日，“每日先驅報”說“賈根黨徒陰謀火燒首府”；“每日快報”說“賈根夫婦追隨茅茅恐怖分子*的榜樣”；“每日郵報”說“圭亞那縱火者的陰謀暴露”。

李特爾頓在發言時講得頭頭是道，但他還是照着事先準備得好好的演講稿念的。他開始先是假意惋惜一番。他說，憲法的廢除是向後倒退了一大步，因為“我們的國家政策”畢竟一直是“規定授與殖民地人民以越來越廣泛地治理本身事務的權利的”。但是賈根和他的伙伴是一幫壞蛋；他們到英國來求援，可是反對黨必須小心，因為這幫人在哪兒都沒有朋友，甚至在他們本國和鄰近的西印度也沒有朋友。然後李特爾頓舉了幾個人名，讀了幾封電報，又引証了圭亞那團體——“有色人種同盟”和“英屬圭亞那鄉長會議”——的電文，而這兩個團體都是擁護英國干涉我國事務的。

李特爾頓覺得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十分安全的。因為他以為反對黨不知道這兩個團體到底是什麼東西，而且我和

* “茅茅”，怯尼亞許多教派中的一支。英國統治集團和英國反動刊物對“茅茅”橫加污蔑，說它進行廣泛的恐怖活動來反對白人。這種說法是一種幌子。英國殖民者在這種幌子的掩護下加緊鎮壓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的非洲人民。——俄譯注

伯納姆博士兩人只能在旁听席上靜听。

可是事实上有文件可以証明李特尔頓提到的兩個团体不久前曾反对普选权。

“乡長會議”由乡的地方行政机关，即乡議會和乡区議会的代表組成。乡議會三分之一的議員是任命的，其余的議員則是在不充分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出的。乡区議会的議員全部是任命的。乡区議会的数目大約要比乡議會多一倍。这些政权机关的首腦就組成“乡長會議”。由此可見，这些人自然要反对我們准备进行的乡村行政改革，因为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实施普选权，取消議員任命制度，并且使乡区議会的权力与乡議會相同。

“英屬圭亞那有色人种同盟”不同于英国的“有色人种同盟”：它并不代表有色人种的一切民族。“英屬圭亞那有色人种同盟”是非洲人的种族主义团体。某一个时期，它在佐治敦市有很大的影响，但后来由于进行反动活动，就丧失了拥护它的人。这个同盟的副主席杰·尼科耳森博士和書記約翰·卡特先生曾被选入1948—1953年的立法會議，但在1953年的选举中遭到失敗。1947年选举后不久，尼科耳森博士便变成政府的忠心耿耿的走卒。他曾拒絕在立法會議中宣讀抨击英国财政部殖民地預算草案报告的声明。在院外他曾經同意反对預算草案中提出的苛捐杂稅，但在立法會議表决时他却投票贊成。人民进步党在1950年1月成立后，“有色人种同盟”在圭亞那，尤其是在該同盟主要根据地佐治敦，丧失了人民群众对它的支持。

不論是“有色人种同盟”还是“乡長會議”，都面临着彻底的瓦解。這兩個团体为什么要欢迎英軍登陸，这是不难明白的：英軍登陸能使它們保持既得利益。

李特尔頓接着引証了人民进步党的敌人——人民民族党的諾曼·曼萊和巴巴突島知名人士格蘭特來·亞當斯——的話(关于這兩位,我在下面再詳述一番)。然后,李特尔頓引証了著名煽動家、牙買加總理布斯塔曼特的言論,之后又引証了英國反對黨——工黨——殖民地問題理論家里達·興頓博士的話。

李特尔頓指出,興頓博士在參加瓦丁頓制憲委員會訪問英屬圭亞那的時候,曾作出一个結論,說人民进步党所謂的民主“就是一黨統治”。

对于里達·興頓博士之輩來說,歷史前進得太快了。在1945年工黨上台之前,興頓博士寫過几本关于殖民地問題的好書。當瓦丁頓委員會在圭亞那搜集資料的時候,我們也正是引証興頓博士自己的話來為我們的憲法要求辯護的。我想,興頓博士永遠也不會忘記1951年10月她在倫敦被人家噓的情形。這大概是她生平頭一次。這件事發生在“有色人種同盟”和“加勒比勞工大會”聯合召集的群眾大會上。那天,她和我兩人都就英屬圭亞那憲法問題發表了演說。

下院這次辯論在這樣一點上是很值得注意的,那就是除一兩個普通工黨議員外,反對黨並不打算認真打一仗。那次辯論中,反對黨的主要發言人是艾德禮和葛里菲斯。許多工黨左翼人士準備狠狠地抨擊一番,但沒有得到議長的許可。

葛里菲斯在他的全篇演說中,幾乎一直在教訓我們,說我們由于採取這樣的行動錯過了極其良好的機會。這表明:在工黨內占統治地位的右翼完全上了李特尔頓的當。李特尔頓的策略是很狡猾的:他從工黨的武器庫中選擇了一種

工党惯用的武器——反共，同时引証工党的朋友和工党报纸的言論。

反对党提出了一項“無关痛癢”(据“論壇”周报的說法)的修正案。這項修正案說：“对白皮書中所指出的英屬圭亞那人民进步党某些領導者的行动和言論，下院深表遺憾。下院并譴責了旨在英国該殖民地建立極权制度的方法。但下院并不認為英屬圭亞那局势的性質需要采取像廢除宪法这样的極端措施。”

可是這項修正案在294票对256票的情況下被否決了。这样一來，李特爾頓的策略得到了完全的勝利。

下院討論以后的几星期內，大家看清了反对党并不准备把英屬圭亞那的問題弄成英帝国全国性的問題。辯論以后不到半个月，“英国职工大会”就發表了一項声明，抨击我們“执行共产主义政策”，还抨击我們“与鉄幕后面的国家联系，与‘世界工会联合会’联系而不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以及‘职工大会’联系”。這項声明还說：“人民进步党通过任政府部長的黨員竭力破坏英屬圭亞那唯一的工会組織，即‘劳动公民协会’。这个工会与企業主訂有集体合同，并有权在專門机构就簽訂集体合同进行談判，結果糖業工人的情况得到了改善。”

這項声明接着說道：

“人民进步党未能用罢工和威胁等手段达到使大家承認‘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目的，結果就想用立法来实现自己的企圖。而这会使部長們(他們也領導着工会，这些工会反对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劳动公民协会’)得到权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实现工業化，同时使工会运动服从于人民进步党。”

显而易见，我們最主要的罪狀是：我們不支持那个通过“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获得“英国职工大会”支持的“劳动公民协会”。在上文中我已經詳尽地叙述了“劳动公民协会”和“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立場。

看来“英国职工大会”并不知道这两个团体的立場。但無論如何，决不能把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否看作是否給与援助和支持的唯一准繩。我知道“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給过“英国职工大会”許多好处，但是对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国民族运动的統一以及我們为面包和自由而作的斗争的胜利。

我坦白地說，自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成立以来，在加勒比美洲，到处是分裂代替了統一。

我們現在回过头来談談几年前的事情。1945年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會議。在这次會議上成立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加勒比美洲曾派遣許多代表出席了會議（英国政府和“英国职工大会”还曾經祝这些代表工作顺利）。同年在英屬圭亞那召开的西印度會議奠定了“加勒比劳工大会”的基础。这个“劳工大会”团結了加勒比美洲一切进步的工会和政党。格蘭特米·亞当斯被选为“劳工大会”的主席，理查德·哈特任書記，牙买加的諾曼·曼萊和英屬圭亞那的赫·納·克里契罗任副主席。

战争结束后不久，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立即展开了爭取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运动。在远东（在馬來亞），人民坚决要求独立。在非洲殖民地，尤其是在尼日里亞和黄金海岸，人民也起来斗争。在加勒比美洲，我們提出了重要的关于宪法的要求。帝国主义者面临着这一斗争，面临着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內工会和政治运动的团結，开始

加紧镇压。

正是在这一时期，“世界工会联合会”发生分裂，成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这次世界工会运动的分裂也影响到加勒比美洲的工会运动。格蘭特来·亞当斯、克里契罗和布拉特蕭都参加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成立会议。不久，成立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拉丁美洲区域组织，而格蘭特来·亞当斯成为加勒比海英国属地分部的主席。

西印度所有工会都发生了分裂。“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和“世界工会联合会”保持微弱的联系，而克里契罗领导的“英属圭亚那工人联合会”则参加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劳动公民协会”也成为“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有力台柱。

1951年夏，“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向“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请求入会。但是这个请求没有被立刻接受。“国际自由工联”书记处要求呈交关于“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的性质和活动的补充材料。

1952年内，在分裂活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发生了两樁重要的事件。

第一，“劳动公民协会”退出了“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这是工会理事会通过两项决议所引起的结果。这两项决议中，一项是请求政府实施类似我们提出的劳工关系法案(这个法案我已经在上面讲过)的法律；另一项是抗议赖昂納尔·拉庫所提出的禁書法令(这项法令我也已在上面讲过)。

到1950年为止，“劳动公民协会”一直反对“英属圭亚那工会理事会”接受“英属圭亚那产业工人联合会”入会。但在1952年夏，“产业工人联合会”主席在特立尼达島和巴巴突

島遇見了“國際自由工聯”的領袖。

這些領袖答應幫助“產業工人聯合會”得到承認。不久，“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區域組織負責人斯·羅莫爾迪來訪英屬圭亞那，到機場歡迎的有“勞動公民協會”的書記。羅莫爾迪拒絕和“工會理事會”的代表見面，並在離境前宣稱“英屬圭亞那工會理事會”“處於共產主義的影響下”。結果，不論是“工會理事會”還是“產業工人聯合會”，再也不提出參加“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的請求了。

1952年另一重要事件是牙買加人民民族黨開除了理查德·哈特、亞瑟·亨利、弗蘭克·希耳和肯·希耳，所用的借口是這些人是“共產黨員”。該黨右翼曾對諾曼·曼萊施以壓力，要求把所有左翼分子開除黨籍。要求開除的起因是人民民族黨內不可避免的衝突。人民民族黨右翼中包括許多企業主和捐客，比如前人民民族黨領袖、京斯敦的賽弗賴特擁有好幾家麵包坊。他的工人則參加“工會理事會”。該黨另一著名右翼領袖威爾斯·艾賽克斯是一個從若干大公司領取定單的捐客，而這些大公司的工人却也參加“工會理事會”。

1952年夏，格蘭特來·亞當斯發表聲明，說“加勒比勞工大會”必須解散。這個聲明引起了我們這些加勒比美洲進步工會領袖的嚴重不安，因為“加勒比勞工大會”是團結西印度一切進步力量的唯一團體。

我們決定在1952年10月安排一次和進步工會領袖的會晤（白皮書把這次會晤也說成是有惡毒的目的的）。來參加這次會晤的，有特立尼達的約翰·拉·羅斯、羅哈斯和昆丁·奧康諾爾，牙買加的理·哈特，聖文森特島的埃·召舒亞。我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我們決定，既然有些工會和民族團

体参加“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另一些工会和民族团体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而这种情况又破坏了“加勒比劳工大会”存在的基础，那就应该只让政治团体参加“加勒比劳工大会”，而另外成立一个既不属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也不属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独立的“加勒比劳工联合会”，由它来团结一切工会。

这个提议转给了格蘭特来·亞当斯。理·哈特带去了“世界工会联合会”驻牙买加代表斐迪南德·史密斯写的一封信。史密斯在信中说他准备向“加勒比劳工联合会”提供财政上的及其他的援助，只要“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也这样做。但是格蘭特来·亞当斯不愿支持这个能保证团结的提议。相反，他竭力企图扼死“加勒比劳工大会”，破坏工人运动的团结。

李特尔顿知道曼莱和亞当斯是“英国职工大会”领袖的思想上的兄弟，因此在下院引证了他们两人的声明。但是，变节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加勒比劳工大会”的活动大大地妨碍了这些所谓的领袖。早在1947年，在孟太戈海湾举行的“加勒比劳工大会”会议上，他们表示同意代表加勒比美洲人民提出自由和自治的要求，表示只有给与“英国殖民地联邦”以自治领导资格并给与各成员以内部自治权，他们才参加该联邦。

但是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不少日子了。1948年，格蘭特来·亞当斯被任命为出席巴黎联合国大会的代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退缩。格蘭特来·亞当斯那时彻头彻尾地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因为这个缘故，各殖民地狠狠地把他抨击了一顿。例如1948年10月，“西非向导报”的社论尖锐地说道：

“……当一……群黑人团结起来为我们所有黑种人的新生活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这末一个黑人会投向敌人。我们的读者……必须记得并且分析关于巴巴突岛的现在在法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个格·亚当斯的活动的新聞，还必须判断一下：英国拿来向全世界大吹大擂的非洲‘领袖’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亚当斯的每一句话都违背我们的利益。亚当斯的活动使我们不安，因为他既不明白非洲，又不想了解我们的观点，就贸然代表我们到联合国去宣传他自己的观点。

我们从来没有说英国人坏得不可救药。没有一个正常的黑人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亚当斯应当知道，一切善良的人都谴责殖民地部所执行的整个政策。

亚当斯变成了外国利益的代理人……他的不负责任的声明狠毒地打击了一切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我们要告诉他：当全世界的黑人终于争取到自己的权利之后，不论是历史还是非洲人民的良知，都不会饶恕他。”

可是亚当斯却得到了优厚的赏赐——英国当今女王授给他圣迈克尔与圣乔治骑士的勳位。到1952年，亚当斯已不再说什么“英国殖民地联邦”应该具有自治领地位的话了。他已经满足于殖民地的地位。

英国工党在不久以后发表的声明说道：

“人民进步党的领袖们不去执行社会改革的政策，不努力去使自己不辜负选民对他们的信任，却去执行共产主义的政策，并且使国家陷入这样恶劣的情况，以致不得不派遣军队去维持法律和秩序。”

事实上，我们的竞选纲领以及我们所实施的或准备实施的法案是些温和的改革，其中有很多是从英国、美国及其

它国家学来的。

英国及其他国家的有地位的杂志把李特尔頓發明的“紅色陰謀”这个神話批評得体無完膚。

例如“印度时报”指出：

“英国政府在准备得十分纘密的罪狀中拿不出一个事实来証明人民进步党党员有什么暴力行为……我国人民还记得不久以前英国政府曾宣布我国民族运动的領袖是日本的間諜，因此我們对这一类罪狀的价值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第八章 我們的活動

像你一樣，我忠實於生活。

——彼得·勃拉克曼

關於人民進步黨的性質和我黨準備在英屬圭亞那做的事情，英國政府和右翼報紙說了很多。它們說的大半是些愚蠢的臆測、十足的誹謗，甚至竟有些惡毒的謊話。它們說這些是為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可是在有理性的、不懷偏見的人們的眼里，只有事實才有價值。因此我願意簡短地追述一下人民進步黨在它當政的這個短短的時期內真正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通過眾議院實施了取消禁書法令的法案。我們取消了禁止西印度居民入境的法令。這兩件事情是我們競選諾言的一部分。

1945年曾經通過一項產稻區農戶法案（保證土地使用權法案），這項法案的目的是在干旱季節內援助產稻區農民。我們當政後，眾議院就這項法案通過了一項旨在保護并保證佃農權利的修正案。1945年通過的法案，除監督稻田的佃租外，還規定對不遵守合理管理及經營條例的地主和佃農加以各種不同的處罰。對那些不好好耕地的佃農，處罰是收回土地。但是對地主就不同了。對那些沒有把排水溝渠和灌溉溝渠收拾得很干淨、沒有把溝渠的莠草去掉或

沒有把堤坝上的灌木去掉的地主，处罰仅仅是：佃农有权退还土地！这难道也可以算是什麼处罰嗎！我們的修正案授权政府地方長官要求地主在一定期限内完成依法应由地主来完成的工程。如果地主拒絕，則政府官員先用政府經費来完成这些工程，然后再向地主征收全部費用。

賴昂納尔·拉庫在參議院發言时，把這項法案說成極权独裁的法案，于是這項法案被否決了。

英軍在英屬圭亞那登陸那天，我們在众議院通过了我們的劳工关系法案。這項法案規定企業主只能和得到大多数工人拥护的工会进行談判和簽訂集体合同。

我們还展开了一个运动，要求取消教会对学校的監督。在英屬圭亞那，学校处于所謂的双重監督下。全国几乎有95%的学校是受教会監督的。这里所說的教会当然是指基督教各教派。可是英屬圭亞那的居民中几乎有一半不是基督教徒。但所有兒童在学校里被强迫灌輸基督教的教义。許多教师，为了謀到一个职位，不得不入教。

我們的建議只是要求由国家和地方教育委员会直接監督学校。我們并不打算廢除宗教教育。我們只准备划出一定的学时来給各教派分別进行宗教教育。

这种制度会比目前的制度民主，因为在目前的制度下，甚至某一基督教教派不能在另一教派的学校里进行宗教教育。

我們縮減了公共工程部的开支。这个部在我国以“公共浪費部”著称。我們打算使“公共工程联合会”更積極地参与公共工程部的事务。公共工程部不論建設什麼，开支大多要比私营公司承包同样工程时討的价錢高1/3乃至一半。

我們提出了改革地方政府的法案。我們要求實施成人普選權，要求廢除地方政府任命制度，要求讓鄉區議會的地位與鄉議會相同。雖然選舉眾議員時是實施普選權的，但地方議員却還是根據舊選舉制度選舉的。投票權還是有財產資格的限制，而在佐治敦和新阿姆斯特丹還有房租資格的限制。

雖然英屬圭亞那的地方政府制度曾得到英國殖民地部很高的評價，認為可做各殖民地的楷式，可是這個制度還是亟待改進的。英屬圭亞那有四种地方政權機構：市政委員會、鄉議會、鄉區議會和村區議會。佐治敦市政委員會由九名民選的和三名任命的委員組成。鄉議會中1/3的議員是任命的。但大部分的鄉村地區是受鄉區議會或村區議會管轄的。鄉區議會的議員全部是任命的，而村區議會則直接受地方政府事務局監督。一切任免權力當然都操在地方政府事務局長的手里，但事實上這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地方政府事務局的所有人員都是由英國總督任命的。

我們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取消“生活必需”經濟部門法案，因為這項法令是一項戰時措施。我們還制訂了建立國家勞工局的計劃，準備由它來進行必要的調解。

我們成立了幾個委員會，準備由這些委員會來研究家庭傭人勞動問題，重新審查工人職業病賠償金法令，以及為農民建立機器站。

我們任命了普通人在政府各局和各種委員會內任職。

為了幫助窮人，我們開始重新審查公家醫生取費的標準。我們主張由當地人在警察局及其它機構內擔任職務。

我們拒絕把國有土地租給已經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礦業公司交納的地租很低，我們打算增加。我們準備

制定土地法，并成立一个特設土地機構，由它来研究有效地利用土地的問題以及一般的土地開發問題。我們縮減了公共基金中不必要的开支。我們拒絕發給參議員薪俸。最后一項措施是根据制宪委員會的建議采取的，但是已故的总督的看法和我們不同，他建議付薪。

我們認為不必派代表到牙买加去欢迎英国女王，因为我們已經派了兩位代表和他們的妻子到倫敦去参加加冕典禮。而且那时候由于女王加冕，我們已經开支了十万元。

我們削減了过分龐大的政府高級官員住宅建設工程。选举前几月，曾發生一件弄得滿城風雨的丑事：政府費了96,000多元替高級官員建筑四所住宅。公共工程部長也曾經和運輸与港务局長發生冲突，因为后者替自己造了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

我們增加了“人民獎学金”的名額。英屬圭亞那沒有任何大学，而以前的政府規定每年只有兩個大学留学生獎学金名額，男青年和女青年各一名。

宪法被廢除前一月，我曾訪問荷屬圭亞那，目的是保护我国漁民在荷屬圭亞那領海內的权益。

1953年1月，取消了三種向甘蔗种植園主人征收的稅：消費稅、出口糖稅和土地稅。我們打算重新征收。

* * *

請再看看我們的政綱。难道这不是每一个进步的英国人都会拥护的政綱嗎？这个政綱象征着流血、縱火和極权統治，还是象征着帮助亟待帮助的人們的願望？

我們的政綱中有几条是从几个最“可敬”的国家的宪法里抄来的。我們的地方政府改革方案是仿效英国的，我們的劳工关系法案借鏡于美国，而我們的土地改革方案則是

从美国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学来的。因此怪不得像“民族”周刊这样有地位的杂志在1953年11月28日說道：

“他們采取的措施在實質上不仅不是共产主义的，甚至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他們的劳工法案是在华格納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他們准备推行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产业部門可以进行調查和表决，以解决正式承認某一个工会的問題，而且調查和表决必須由英国官員主持。

此外，任何一个想充当工人正式談判代表的工会，它必須获得工人票数的65%，这样它才能正式得到承認。

人民进步党所支持的‘英屬圭亞那产业工人联合会’，也正是希望在这样的条件下代替‘劳动公民协会’而在糖業及其它产业部門內成为正式的团体。”

那末，英国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發表声明的原因又何在呢？是不是因为受了“英国职工大会”領袖們的影响（由于我們胆敢反对“劳动公民协会”，“职工大会”已經發表声明責难我們）？还是因为我們在工党政府执政期間曾反对它并且有时狠狠抨击了它？

因此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問題：工党政府对殖民地人民的政策到底怎么样？这个問題值得詳細地談談。

第九章 工党和殖民地

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现代的帝国主义就是發展到最贪婪最好战阶段的资本主义。

——凱尔·哈迪

我們是光榮的老大英帝国的好朋友，我們今后还将忠实于它。

——赫伯特·摩里遜*

我們批評英国工党政府对殖民地的态度，难道批評得不对嗎？工党党员必須記得我們是殖民地人民，必須設身處地想一想。只有这样，他們才能看到工党政府殖民地政策中的缺点。

1946年，已故的欧內斯特·貝文在英国下議院說道：

“我相信：不列顛帝国一旦崩潰，我国选民的生活水平必將大大降低。”

每一个英国工党党员必須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假如貝文說的竟是真話，那就說明：英国的生活水平之所以高，仅仅是靠了殖民地的生活水平低，仅仅是靠了剝削英屬圭亞那等殖民地的人民。我相信，沒有一个正直的工党党员会喜欢这样的局面的。

* 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中譯注

对我们来说，貝文的这句话是听得滥熟的老调。这句话和老牌帝国主义者温斯顿·丘吉尔在1929年所说的毫无区别。当时丘吉尔任财政大臣，他说：

“我国收入的佣金以及因为帮助外国而得到的佣金超过6,500万英镑。此外，我们从国外投资方面每年经常收入将近三亿英镑。这就是我国赖以弥补社会事业开支的财源。我国社会事业开支的浩大，是欧洲乃至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1947年当工党执政时，“波克兄弟公司”的经理弗·杰·西福在我国选举中遭到失败，但是总督立即任命他为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员。我们向英国殖民大臣提出抗议，可是殖民大臣答复我们，说这样做是为了英属圭亚那人民的利益。

1948年当警察枪杀恩穆尔种植园的工人的时候，总督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委员会承认“警察曾经在没有必要的时候开枪”。我们要求把命令警察向工人开枪的警官交法庭审判。可是这个警官却得到了奖章。

在英国工党执政的整个时期内，派到加勒比美洲来的官员和总督还是以前的一流人物。例外的只有工党党员鲍德温勋爵。所有派到西印度来的官员，思想都很保守，总是以符合于种植园主人的利益的方式来治理国家。亚瑟·刘易斯教授在他写的“西印度境内的劳动”这本小册子里鲜明地刻划出了官吏所扮演的角色。他说：

“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种印象：总督和官吏只不过是白种种植园主人、商人和银行家寡头手中的顺从的工具。总督和官吏几乎在这些人的圈子里消磨了全部时间。他们企图把政府的政策变成本地俱乐部的政策，在玩一局高尔夫球

戏或喝一杯威士忌苏打的时候把政策决定下来。”

1950年派到英屬圭亞那的制宪委员会，在實質上是支持保守党的政策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保守党人、前英屬圭亞那总督約翰·瓦丁頓爵士；一个委員是自由党人文森特·哈勞教授；另一个委員是費边派社会主义者里达·兴頓博士，她在不久前也开始攻訐我党和我們的政府。

工党政府殖民大臣詹姆斯·葛里菲斯也使我們煩惱；甚至比制宪委员会更使我們煩惱。根据制宪委员会的建議，只有下院的24名民选議員才能选举六名部長（为此，只要有13票便可占多数）。葛里菲斯却建議三名任命的議員也參加投票。这样一来，如果反对党想击败多数党而和三名任命的議員勾結在一起，再把一两个議員拉过去，答应讓他們当部長，那末，多数党要战胜反对党，就至少要有14票才能占多数。

葛里菲斯建議把由十人組成的行政會議中的民选部長从六名减少到五名。这就是說，民选部長的多數將由6:4減弱到5:4。总督的地位还是曖昧不明，因为制宪委员会的报告中一点也沒有說到；总督在行政會議中除了贊成票与反对票相等时可以投“决定票”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投“表决票”。而在民选部長只占5:4的多數的情况下，如果总督既能投“决定票”又能參加表决，那就会極其不妙，因为行政會議的权力將會全部操在总督的手里。

总算我們走运，已故的总督查尔斯·伍萊爵士不同意葛里菲斯的建議。正当預料我們能得到五席、至多七席的时候，保守党代替工党上台了，李特尔頓同意了总督的意見。

現在来談一談英国工党政府对殖民地的經濟政策。英王在1950年3月發表的演說中这样告訴我們：

“我的政府積極地推進殖民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殖民地開發公司’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有效工具。”

1951年，查爾斯·伍萊爵士在回答我反對殖民地境內剝削制度的演說時，几乎是解釋英王的演說。他說：

“女王陛下政府對其一切屬地的經濟政策，其基本宗旨是開發殖民地以增進殖民地人民的福利。這個宗旨也表現在成立‘殖民地開發公司’上。我希望大家對這個宗旨沒有任何誤解。像某些集團那樣把我們的政策叫做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政策，這不但是絕對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

但是“殖民地開發公司”董事長特列夫加恩勳爵在1950年對一群利物浦實業家所作的演說中揭穿了這個神話。他說：

“聯合王國的美元赤字每年為五億英鎊。對殖民地的生產力應該根據這個赤字來考慮。假如在最近十年內，殖民地能把總生產力每年提高二億英鎊，那對於我們真是件十分值得感謝的事情。

我們所以向殖民地求助，是因為它們的產品——糧食和原料比工業品易于為美國所接受。1947年美國從世界各國輸入的工業品總值為2億5,000萬英鎊，而輸入的糧食和原料總值超過此數三倍以上。由於出產錫、橡膠、可可等等的原料，殖民地在調節美元英鎊平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增加殖民地產品的輸出量以換取美元，這顯然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因此怪不得“殖民地開發公司”把資本投到英屬圭亞那的林業和金礦採掘業中去。在“英屬圭亞那統一金礦公司”中投入的資本約有200萬美元。因為要得到美元就必須有黃金。

至于制造紙張、木漿、膠合板、玻璃、水泥和电鑄件等的工業，“殖民地開發公司”一点也不表示关心，虽然曾經花了不少錢去研究制造这些产品的問題，而且前顧問工程師克·奧·蔡斯及其他專家也曾建議生产这些产品。

工党政府粮食大臣約翰·斯特拉徹的观点与特列夫加恩勳爵相同，但他說得直截了当得多。他說：

“我們国家的情况十分严重，以致我們不能任意对發展我国殖民地的这种或那种方法表示不滿。我們必須不擇手段，用一切方法来發展英联邦各殖民地和屬地的各种原料工業，并使原料工業的生产量比現在大大提高。这是有关英国經濟存亡的問題，这样說决不是言过其实。”

說倒是說“發展”，可就不是走工業化路綫。已故的工党政府財政大臣斯塔福特·克利浦斯爵士于1947年在英国非洲殖民地总督會議上演說时，曾強調指出：

“我知道，你們准备研究發展殖民地工業的問題。虽然我个人認為殖民地工業的發展是極其必要的，只要不發展得太过分太快，可是大家还得明白：在目前世界市場上資本財貨不足的情况下，不能使殖民地实现广泛的工業化。”

这种观点完全在殖民地發展十年計劃中反映出来。据統計，在用于英国所有殖民地的計劃开支总金额199,422,000英鎊中，只有3,356,000英鎊將用来建筑供应工業所需电力的發电厂。

保守党政府当然繼續奉行这种为賺取美元而剝削殖民地的政策。1951年，保守党对奧利佛·李特尔頓被任命为殖民大臣一事大为捧場。当时英国的美元平衡情况恶化，对殖民地的剝削日見加剧。

“泰晤士报”在1951年11月3日說，靠殖民地貿易得来的美元盈余在1945—1949年約为1亿5,000万元，在1950年增加到3亿7,600万元，而在1951年上半年已达到3亿1,400万元。殖民地的英鎊結余在1947年为5亿1,000万鎊，1951年7月增加到9亿800万鎊。

1951年，馬來亞的錫和橡膠所換到的美元比英国全部出口貨物所換到的还要多。英屬圭亞那的鉄矾土不仅拿去制造战略物資——鋁，而且还換来了美元。英国只准我們花去我們所得到的美元的半数左右。可是美元赤字还是沒有消灭掉。

* * *

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声明中說，人民进步党所执行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派遣軍队到我国来維持法律和秩序。事实上，在我国根本就沒有过騷乱的現象。我在前面已經引过来我国采訪的报館記者的意見。現在再举一則載于10月7日“每日邮报”的新聞：

“英屬圭亞那警察局代理局長威丁海姆先生，今天自該殖民地首府佐治敦打来無綫電話。他的声音平靜而有信心。他說：‘市內沒有示威游行，也沒有总罢工，而且一般說来沒有發生什么不正常的情況。’

記者告訴他，手头有些报告說有共产党工人在佐治敦市內的国会大厦周圍举行示威游行。

威丁海姆先生說：‘市內沒有任何示威游行，也沒有任何騷乱的現象。’”

軍队派到我国来，并不是为了維持秩序，而是为了鎮压廢除我国宪法以及黜免进步部長这两件事可能引起的騷乱。

加在我們头上的罪狀并不是黜免我們的原因。促使英國政府把我們免職的真正原因倒底是什麼呢？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如果我們再繼續執政幾個月，總督的立場和全部憲法制度將要被人民完全看穿。第二，美國曾經向英國政府加了很大的壓力，這是毋庸置疑的。

在下一章中我就來談談這兩個原因。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

有些人自以为知道人民的价值，
忽而把人民分，忽而把人民合，全看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是为了那个优秀民族，那是为了这个阶级，
对什么，他们都能论个是非曲直，
我说的话，要请他们牢记。

——彼得·勃拉克曼

英軍开入英屬圭亞那，人民已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总督对我们的立法所采取的立场。

上院(参议院)已经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两项法案。一项法案是决定取消禁书法令，另一项是取消1945年的产稻区农户法令(保证土地使用权法令)。

我們也曾通过其它某些法案。

其中包括地方政府改革法案。我前面已经说过，提出这项地方政府法案的目的是使英屬圭亞那人民享受到普选权，以及取消市議員和乡議員任命制度。当这项议案提交到行政会议讨论的时候，总督告诉我们，說我們必須傾听社会輿論并把我們的提議提交乡長會議和乡村耆宿討論。

我們向总督指出，我們的提議是我們竞选綱領的一部分，而人民就是在这个竞选綱領的基础上选举我們的。此外，我們还向总督指出乡長會議的反动性質。但是为了表

示我們对总督的尊重，我們接受了总督的提議，把我們的法案交下級政权机关討論。

总督这一着棋当然是很狡猾的。我們爭取在1953年11月之前，即在地方政权机关选举前，通过我們的法案。而总督則希望他这一着棋可以推迟討論這項法案，并且可以促使地方政权机关中的反动分子反对這項法案，以便总督否决這項法案时得到支持。

就像总督所期待的，这些人表示对我們的提議不滿；我国三家資本主义报纸代表他們大事攻訐。

我在前面說过的劳工关系法案是在英軍在英屬圭亞那登陸那一天通过的。

我們还会計劃改变土地法，目的是成立一个特設土地机构，由它来征收荒地的賦稅并研究正确利用这些荒地的問題。我們建議向甘蔗种植园主人征收三种稅：消費稅、土地稅和出口糖稅。这三种稅显然都会遭到种植园主人的反对。对那些授与英屬圭亞那采矿业中外国資本以免稅及其它特权的法律，我們也曾建議加以修正。

我国的上院与英国的貴族院相仿。对财政法案的通过，上院可以拖延三个月，对其它法案的通过可以拖延一年。但我国的宪法有一点和英国不同：某一项法案为上院或下院否决后，如果总督認為這項法案对国家經濟和人民福利具有举足輕重的重要性，他有权在法案擱置期限到期之前召开兩院联席會議。

我們請求总督动用宪法授与他的权力，召开兩院联席會議来討論劳工关系法案和地方政府法案。這項請求，总督無疑会拒絕接受。但是他一拒絕，我們就可把他的真面目揭露給圭亞那全体人民看。

万一总督终于召开了兩院联席會議，他就不得不簽署這兩項法案，因為我們是多数党，占36席中的20席（在下院27席中占18席，在上院9席中占2席）。总督当然也可以拒絕簽署，但他的绝对否决权也会使我国人民把他看穿。

或此或彼，总督都会失去民心。

总督在1953年3月到英屬圭亞那蒞任后，常常和他的妻子賽維治夫人一起去訪問农村，到农民的小木屋里去看看，摸摸农民孩子的头，等等。他想用这种方法来使人民爱戴

他告訴农民，說英国政府关怀着他們的福利，而他作为政府的公務員，將竭尽全力来改善他們的生活条件；但是，他說，遺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沒有必需的权力，因为权力全部操在农民自己选出来的部長們手里；不过無論如何，只要这些部長是在为人民服务，他总是要支持他們的。显然，总督只要一表示他反对我們所采取的措施，他就会失去用这种方法勉强树立起来的微弱名声。人民就会明白，为什么总督一开始就反对宪法。人民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們要散發“修正宪法爱国呼吁書”。

英国政府的声明中說，英軍所以开到英屬圭亞那，是为了制止我們实现旨在消灭宪法和国家機構的共产主义陰謀。事实上，英軍开入我国是为了防止英国总督和英屬圭亞那宪法的真面目被揭露。

还有一点，即美国的压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們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后不久，美国的报章杂志就意識到英屬圭亞那事件的重要性。“时代”杂志說，英帝国范國內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成立了。著名的美国專欄作家德

魯·皮尔遜写了一篇由报纸辛迪加發表的專欄文章。皮尔遜在这篇文章中警告美国人民；他說，当美国人在遙远的朝鮮为反抗共产主义和保衛民主而作战的时候，美国的身边却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政府。

美国国务院也开始積極干預英屬圭亞那事务。

駐在特立尼达島的美国副領事几度訪問英屬圭亞那。我們被免职之前一个月，美国众議員杰克遜先生作为总督的貴宾，訪問了我国沿海地区。杰克遜先生在离境前發表談話，說英屬圭亞那是在美国的战略地帶內。这与华尔特·里佩教授所見不謀而合。这位教授曾說加勒比美洲是美国的安全地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在圭亞那和西印度一切島嶼上修建了基地，作为送給英国几艘破旧魚雷艦的交換条件。

我們有什么証据可以証明美国干涉我国事务呢？

首先是“波克兄弟—麦克康尼尔公司”倫敦分公司經理杰·坎貝尔的声明。坎貝尔剛得到英軍派往英屬圭亞那的消息，就說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担心，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派遣軍隊，因为据他所知，危机已經結束。坎貝尔所說的危机，是指持續五周的糖業工人罢工。这次罢工是在英軍开到之前約兩星期解决的。坎貝尔的声明說明了一点：虽然我們的綢領也使种植园主人为自己的投資而担心，但决不是他們向英国政府施加决定性的压力的。

“华盛顿邮报”承認人民进步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在美国引起了某些惊慌。这家报纸声称，必須剝夺我們的本来就很有限的权利，并且建議恢复总督的十足的权力。

“紐約先驅論壇报”在10月9日說：“英屬圭亞那对美国極其重要。这并不是由于該殖民地境內發生的事件，而是

由于該殖民地的战略地位。它的鄰国委內瑞拉是石油和鉄矿的同义詞，而石油和鉄矿是对美国非常重要的东西。”

“教堂时报”在10月16日說：“在委內瑞拉境內毗鄰英屬圭亞那的地方發現若干鉄矿体，分布面积达75平方英里。在国境的那一边，即在英屬圭亞那，也發現若干鉄矿体。这两国内發現的新矿体可能是同一矿床。据称，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鉄矿床。

同时，在發現新矿床的地区，英屬圭亞那和委內瑞拉之間的国界是一个爭执不下的問題。这也是美国对該地区局势惡化表示关心的原因之一。”

許多外国公司，首先是美国公司，目前在广泛調查英屬圭亞那的地下資源，目的是勘查錳、石油及其它战略矿物。美国人在我国开采鋁矿，用它来熔煉耐热合金，以便制造噴气式轟炸机(除英屬圭亞那外，仅尼日里亞有鋁矿床)。在我国还勘查放射性鈾。

美国資本在英屬圭亞那分布得很广。比如，“达木拉拉鉄矾土公司”及其姊妹公司“史普罗司东斯公司”属于“加拿大鋁公司”，而“加拿大鋁公司”則属于美国最大的金融家之一梅隆控制的壟断資本“美国鋁公司”。这家公司在1952年約出产了250万吨鉄矾土。

“伯比斯(鉄矾土)公司”不久前盤給了美国的另一家龐大的鋁公司——“雷諾金屬公司”。經營鉄矾土开采業的，还有美国其它康采恩——“肯奈柯特公司”和“哈威鋁公司”。

無怪乎“每日邮报”在10月9日自佐治敦發出的报导中这样說：

“据佐治敦可靠方面称，美国政府的惊慌在英国政府决定派遣軍隊开入英屬圭亞那一事上起了不小的作用。美国

政府之所以惊慌，是因为美国人在大战期间曾在佐治敦附近的阿特金逊机场修建了若干军事建筑物。”

大战期间，美国人曾在我国修建了海军和空军基地。他们的空军基地已在不久前停止使用，但随时都可能恢复。

李特尔顿断然否认美国政府曾直接干涉。在下院辩论时，他说：“女王陛下政府作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并没有收到美国政府的任何建议。”

而当时在女王签署废除我国宪法的敕令后，这位先生自苏格兰的巴摩拉尔行宫回到伦敦机场时，有记者问到英国政府在圭亚那可能采取的迫切行动，这位先生曾经说：“我们的巴摩拉尔之行不过是枢密院成员对女王所作的一次普通的访问。”

美国国务院对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立即表示赞同。

美国国务院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亨利·白劳德，在我国宪法废除后不久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声明，说明应该在什么时候以及怎么样给殖民地人民自由。“泰晤士报”在1953年11月2日这样报导：

“美国发言人在星期六对有属地的强国发出警告，表示反对它们匆忙地拒绝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亨利·白劳德先生宣布他的国家将运用自己的影响来帮助殖民地人民获得自治，并且在大多数场合支持宗主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但是白劳德先生同时又明显地指出了‘过早’独立的危险。”

可是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政府绝没有参加蹂躏英属圭亚那的民主。在印度的巴特拿市，一位美国教授及其妻子告诉我，说他们不相信美国曾经干涉。某些美国人还是认

为美国到现在还忠于杰弗遜、罗伯特·潘恩、派屈里克·亨利、林肯及美国其他爱国者的民主思想，还是認為并不存在“美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他們引証了美国准备給波多黎各独立这个事实。他們天真地相信美国关心落后地区的發展，举出了杜魯門第四点計劃为例。但是他們可能并没有了解这个所謂援助計劃的真正意义。

遺憾的是我不得不叫这些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失望。杜魯門第四点計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所謂落后地区实现工業化，保証美国卖出更多的設備，并且为美国的投資扫清道路。对大多数人來說，美国計劃的这些目的不是一个秘密。

1950年3月30日，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遜在參議院外交委员会作証时說：

“許多人以为我們准备为这些落后民族建設大規模的工厂和矿井。这种想法是錯誤的。”

“西方万国电器公司”副董事長尤金·斯·格雷格說得更加露骨。1952年5月5日他在“紐約时报”上发表文章說：

“我国政府在‘杜魯門第四点計劃’方面的任务，应仅限于發展保健、教育和港口运输等的社会事業。如果这些社会事業的發展能促使美国所需战略原料开采量增加，那末我們更應該特別着眼于此。”

美国“报导”双周刊在不久前出版的專号中評論“第四点計劃”时指出：“我們需要原料，但是我們不願負起征服并治理原料出产国的重担。”

可不是嗎，再也不必直接征服別的国家了。治理国家是一件十分令人头痛的事。只要有“友好的”政府，像在荷屬圭亞那那样就行了。在荷屬圭亞那，当政的是“民族主义”

政党，同时駐紮有荷蘭軍隊，但一切均听命于美国（得自鉄矾土的进項大半流入美国）。

順便說說，我在我国宪法被廢除之前一个月曾訪問荷屬圭亞那，当时該国的“民族主义”政府曾設宴欢迎我。可是我們被黜免后，这个政府甚至不准我們在荷屬圭亞那逗留一夜，讓我們能在那里改搭飞机。这無疑是得到美国的指示的。美国曾拒絕發給我們經過紐約的过境証。

这就是美国所需要的“友好的”政府。一旦某国有什么“不友好的”行为，就毫不費事地通过收买的軍隊来这从一次“革命”，就像在拉丁美洲国家內那样。至于在这种“革命”行不通的地方，例如在英屬圭亞那，那末就要用炮艦来对付了。

我們被免职的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其所以“必須派遣軍隊以維持法律和秩序”，并不是由于我們的活动。有一位記者把我們叫做“宪法热中者”。我們在合于宪法的範圍內进行活动，同时散發全国請願書，即“修改宪法爱国呼吁書”，号召大家簽名。我們沒有擅自修改宪法的权力。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众議院中提出自己的法案，再轉呈給英国政府。

至于“紅色陰謀”，那連我們最惡毒的死对头、曾在战时在反間諜处軍官的“商船日报”編輯都說，他“絲毫不知道有什么筹划妥当的起义計劃”。10月11日，他在社論中說：

“人民进步党領袖們竭力企圖引起政治和宪法危机（一切証据都說明了这一点），企圖重新向选民求援，从选民那里取得强大的支持，使我們很难和他們对抗。”

这些企圖当然并不違反宪法。

第十一章 被告席上的民主

你回去后，請你告訴你的同胞，你在英国看見了些什么。請你告訴他們，英國的憲章主義者舉起了鬥爭的旗幟，拋棄了民族仇恨，高呼全世界人的博愛，並且準備在你們的事業中證明自己的真誠。

——歐內斯特·瓊斯

英国工黨某些人士說我們犯了大錯，還說我們走得太遠了。但是我們的這些批評家似乎需要反省一番，自我批評一番。

當剛發生英屬圭亞那危機問題的時候，英国工黨總書記摩根·菲利普斯在格羅斯斯特的群眾大會上說：

“如果今後仍舊不能提出確實的證據足以證明人民進步黨人的陰謀，那末，英国政府所採取的措施將會使旁人懷疑英国準備發展殖民地自治的誠意。”

後來當然仍舊沒有提出任何確實的證據。但是遺憾得很，英国工黨執行委員會在1953年11月發表的聲明中，雖然強調“必須發展殖民地的民主自治”，同時却宣布“工黨地方組織不宜向人民進步黨的演講人提供講台，也不宜與其它也可能處在共產黨人影響下的團體一起支持人民進步黨。”

這自然是一件令人傷心的事，但更令人傷心的是，據人

家告訴我，這項決議是以一票的多數通過的。

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使李特爾頓勇氣百倍。他不久以後就向布干達開火，廢黜了卡巴卡*。在英屬圭亞那，人民進步黨有五位領袖被捕，其中包括前任公共工程與交通部長以及兩名眾議員。兩個青年團體與和平委員會被封閉。總督禁止發售一系列的書籍，雖然這些書在倫敦街頭上是隨處可購的。

就在發生這些事情的那個星期，英國政府宣布它準備把歐洲委員會批准的人權公約在英帝國所有42個殖民地內付諸實現！

工黨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幸喜還不是整個工人運動的決議。共產黨、“工人日報”、“論壇”週報以及“前衛”、“社會主義前途”、“雷諾新聞”等週刊完全支持我們。

幾位知名的英國議員，包括比萬派在內，給予我們強有力的支持。工黨執行委員會作出決議後，議員伊恩·米卡多仍然在他的選民面前發表演說，表示支持我們的綱領。

伯納姆博士和我在英國各地旅行時，曾受到英國工黨的普通黨員的熱烈支持。

許多工黨黨員——市議員、工會工作人員——起來反對執行委員會的禁令。市議員安德魯·伍德曾主持在格拉斯哥為我們召開的群眾大會，他勇敢地宣稱，在他身上“還保持着不少戰鬥精神。”

* 布干達——是一個不大的封建土邦，如今是英國殖民地烏干達（東非）的一個省分。在日益壯大的人民群眾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壓力下，以前唯英國總督之命是聽的布干達統治者（卡巴卡）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削弱了英帝國主義在布干達的障地。為此，卡巴卡在1953年11月30日被廢。——俄譯注

“民主監督聯盟”、“費邊社”、“各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同盟”等團體都曾經幫我們的忙，並且在某些當地領袖吓得不敢出頭的地方協助我們召開了群眾大會。

後來我們游歷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和歐洲各地時，發現許多人極其同情我們，極其支持我們的事業。我們到處發現大家對殖民地問題極為關心，到處發現大家抗議那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稱之為“殖民主義的強化”的現象。

在英國工人運動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繼續剝削殖民地人民；另一條是爭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獨立。

現在的英國政府選擇了第一條道路。英國政府在英屬圭亞那消滅了民主，把自治變成了一出滑稽戲。李特爾頓把我們民主選出的政府一手推翻，代之以一個官方機構，任用了官員、上屆立法會議官方任命的議員和競選失敗的候選人（其中四人在1953年的選舉中甚至喪失了保證金）。李特爾頓派了一個制憲委員會到圭亞那，但這並不是為了起草一部較民主的憲法，而是為了把憲法修改得更不利於我國人民。請你們看看授與這個委員會的委任書的措辭：

“根據那些使英屬圭亞那憲法不得不廢除的事件，考慮並提出對憲法的必要的修改。”

不言而喻，這個委員會並不是去追究是否由於我們的行動才使憲法不得不廢除的。

對這個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李特爾頓已經在英國下議院說過，如果在英屬圭亞那行政會議中占多數的是官員，那末在英屬圭亞那就不会發生任何騷亂。

英國政府的确準備從殖民地發展與福利基金中抽出

3,125,000英鎊撥給英屬圭亞那，供實現我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之用（要完成這一計劃，需要1,500萬英鎊）。我們歡迎這一步驟。但是這筆錢是白費的，因為如今在英屬圭亞那當權的是種植園主人和他們的朋友。一切問題都是由他們決定的，因此這筆錢一定會遭到與以前這一類貸款相同的命運。

更使人擔心的是李特爾頓所宣布的新主張。1953年10月22日他在英國下議院說：“女王陛下政府決不容忍英聯邦內有共產主義國家成立。”

10月9日在馬爾加特舉行的保守黨年會上所講的並且得到與會者歡呼的，也是這一套，不過說法稍許不同。這個主張里有些新東西。它是在威脅各自治領的工人運動、特別是英國的工人運動。這種威脅完全是希特勒的味道。你決不可冒犯資本主義的堡壘，不然就派軍隊去揍你！李特爾頓使用了反共武器。當初希特勒的做法也是這樣的。

可是李特爾頓對共產主義所下的定義是有伸縮性的。任何事物，只要有背於他的帝國主義利益，就可以叫做共產主義。我們知道南非聯邦境內發生的事情。在南非聯邦，對馬蘭法西斯政府所奉行的種族歧視政策偶有非議，即被認為是進行共產主義活動。據鎮壓共產主義條例所載，在共產主義的定義中有這樣一條：“任何主張或計劃，如果其目的在於：（甲）用煽動騷亂的方法或借助於非法行為來進行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上的任何變革；（乙）為達到上述企圖而在歐洲人和非歐洲人之間灌輸敵視情緒，則該主張或計劃即為共產主義。”

在南非聯邦，邁克爾·司各脫牧師所著的小冊子“非洲暗影”和聯合國攝制的影片“人民大憲章”被宣布是“顛復

性”的，分別遭到禁售和禁映。

不久以前在英屬圭亞那，我的妻子被控破壞軍事戒嚴條例，組織群眾大會。在審判時，警官宣布賈瓦哈爾·尼赫魯的自傳“通往自由之路”是共產主義書籍。

安奈林·比萬先生在群眾大會上公開反對保守黨政府在英屬圭亞那採取的行動和李特爾頓的主張。他用下面這句話說明了李特爾頓這一主張的實質：“你們可以自由選擇你們所喜歡的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必須也是我們所喜歡的。”

目前圭亞那的主要問題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人民——殖民地人民——有沒有自治的權利。人家告訴我們，這個權利是得到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人權宣言的保障的。大西洋憲章表示“尊重一切人民選擇其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而人權宣言則承認“政府權力的基礎必須是人民的意志。”

現在在被告席上的既不是人民進步黨，也不是共產主義。在被告席上的是民主。據說，民主的基礎是選民投的票。可是在我國，却打着民主的幌子用武力和暴力威脅的手段把人民選出的政府推翻了。英國政府用武力威脅代替了投票。

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人權宣言中規定了的權利難道只是口頭上說說的嗎？

對這樣一個問題，一切熱愛民主的公正人士都應該好好考慮。英屬圭亞那事件是一個嚴重的考驗。西方民主的命運如今取決於工人運動聯合力量對這個問題答復得如何。

英國議員珍尼·李在倫敦一個有許多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大聲疾呼：“由於保守黨政府在英屬圭亞那採取了獨裁

政策，普遍憤怒的浪潮必須把保守黨政府沖得一干二淨。”

英國的工人運動必須響應這個號召。工人運動必須恢復光榮的往昔的戰鬥精神。工人運動必須像“英國職工大會”在1925年所通過的宣言中那樣，發出雄壯的吼聲。這個宣言說道：

“‘職工大會’認為英國政府對非英國人民的統治是一種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其目的是保證英國資本家：（1）獲得廉價的原料來源；（2）有權剝削廉價的、無組織的勞動并使英國的工人狀況惡化。

‘職工大會’宣布自己是帝國主義的永不妥協的敵人，決定：（1）支持英帝國各地所有工人組織工會和政黨來捍衛他們的利益；（2）支持英帝國各民族取得民族自決權，包括完全從英帝國分立出去的权利。”

工人運動不能讓李特爾頓所說的關於共產主義的神話搞得四分五裂。當初，希特勒曾用這個反共武器來鎮壓工人運動。而“分而治之”這個政策是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政策。

李特爾頓的政策是剝削和掠奪殖民地人民及其財富的道路。對英國人民來說，這個政策意味着在怯尼亞和馬來亞進行着的那種殘暴的戰爭。這個政策意味着兵役、生產的減縮、巨額的軍事開支、津貼的減少以及生活水平的降低。

另外還有一條道路，這就是合作、彼此諒解和平等的道路，殖民地人民和英國人民互利的道路。

但願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指出，英國的工人運動曾經在這個英國史和世界史上危急的關鍵性時期，起了決定性的、先進的作用。

尾 声

英国人什么宪法都可以給殖民地人民，可就是不給自由的宪法。

帝国主义主子們永远不会把这样的宪法給予被剝削的人民。人民应该在堅韌不拔的斗争中把它争取得来。要帝国主义列强把自治权給予殖民地人民，这比要狗吐出骨头或要烏鴉离开兽屍更难。

——悉尼·金

罗伯遜制宪委员会终于在1954年11月2日向英国下議院提出了大家期待已久的报告。同时在英屬圭亞那和西印度也公布了这个报告。殖民大臣倫諾克斯一波伊德在英国下議院發言，而艾尔弗雷德·賽維治爵士則在英屬圭亞那临时立法會議發表虛声恫吓的演說。

制宪委员会的报告中沒有任何出人意料的東西。我在事先已經猜着这个委员会会提出些什么建議。首先，报告中完全为英国政府廢除我国宪法并黜免我的內閣一事辯护。报告中这样說：

“我們确信：目前在英屬圭亞那所以有脫离正常宪法發展方向的現象，并不是由于宪法有什么缺点，而是由于人民进步党的領導者企圖利用政府权力来达到他們的反民主的

顛复性目的，由于他們不擇手段。”

不用說，“反民主的顛复性目的”這些話是和“險惡的共产主义过激分子”等字眼配合起來的。他們一般把我国宪法遭到蹂躪的主要原因說成是“共产主义的威胁”。他們對我們說，我們的喪失宪法是咎由自取，是由于我們對宪法“有偏見”的緣故。他們從我們批評宪法的演講和文章引了些話，把這些話當做証實他們這種說法的証据。

我們的确曾發表演講，辛辣地批評殘缺不全的瓦丁頓宪法。我們反對總督以及任命的上院擁有無上的權力（上院有權拖延它不喜欢的法案的通過）。我們還反對這樣一點：根據這部宪法，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警察部長、情報與司法部長等職是委任給倫敦派來的政府官吏的。最後，我們還反對總督擁有否決權和非常權力。可是，遠在4月選舉以及1953年5月我們執政前，白厅就已經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對宪法和共产主义的態度。

宪法的被廢除并不是由于我們反對宪法，并不是由于我們拒絕服從宪法。相反，我們是在宪法的範圍內採取行動的。宪法被廢除的全部原因在於我們的行動不符合于宪法製造者的計劃。人民進步黨部長在決定政府全盤政策的機構——行政會議——的十名委員中占六名；宪法制度在這六名部長的壓迫下搖搖欲墜。我們控制了行政會議後，就可以把我們的活動集中在一個目的上，即揭穿總督和我們的殘缺不全的宪法。而1953年10月英軍在英屬圭亞那登陸，也正是因为要防止我們揭穿，根本不是因為我們的“反民主的顛复性目的。”

制宪委員會的報告中關於英屬圭亞那的未來說了些什么呢？

报告中說：“由此可見，我們不得不承認：只要人民进步党还在該殖民地的治理上起着領導作用，只要人民进步党还繼續奉行它的政策，就不能談到恢复真正的自治。因为我們沒有任何把握說該殖民地內今后再不会發生宪法危机。

毋庸怀疑，經濟基础不穩固的英屬圭亞那不容許再有这样的危机發生。因此，我們不得不建議暫時停止向自治發展。”

但是，使制宪委员会感到不安的，并不是我們的“在国家生活中的領導作用”。这种領導作用我們老早就已經起了。瓦丁頓制宪委员会于1950—51年第一次来英屬圭亞那时，就已經認識到这一点。从这个时候起，人民进步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只有增長，沒有降低。

瓦丁頓委员会当时并不是盲目瞎干的。該委员会深信我們的党不会在五年到十年內成長起来，因而不会在普选中获得多数票。由于这样的信心，瓦丁頓委员会冒險地給了我們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冒險地把行政會議中民选委員人数对官方委員人数之比規定为6:4。可是我們在1953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了众院24席中的18席。这一巨大的胜利把瓦丁頓委员会的如意算盤全部打乱。这个委员会的錯誤也就在于此。

罗伯遜委员会則沒有重复这样的錯誤。它細致地研究了人民的情緒。在这一点上，無疑會有許多特务和1953年10月9日以后到达我国的“公正的”观察家帮助了这个委员会。

倫敦“泰晤士报”的記者指出，我們在我国“站得很穩”，并說我們的“威信一点也沒有降低”。他又說：

“不必怀疑下一次普选的结果如何。人民进步党將繼

續是種植園工人和農民中唯一的政治力量。新成立的国家民主党威信很低，某些地方的居民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政党存在”。(着重点是我加的。——契·賈根)

罗伯遜制宪委员会这样确定了人民完全支持人民进步党之后，不得不从下面两个决定中选择一个：

第一：禁止人民进步党进行活动，并且剥夺我党某些“过激派”领袖的选举权。

第二：把选举無定期地拖延下去，并且使我国暂时停止向自治發展。

由于下面两个原因，采取了第二个决定。

第一：大家知道，禁止一个政党活动并不就是把把这个党消灭掉。印度国大党曾被禁止活动，但它终于引导印度人民取得了政治独立。

第二：剥夺某些“过激派”领袖的选举权(从这个委员会的观点来看，最好是原来就沒有选举权)，这会引起不大令人愉快的后果。制宪委员会得考虑考虑世界輿論。而世界輿論大概是会抨击推行南非联邦总理馬蘭博士的法西斯方法这样的做法的。馬蘭博士的政府曾經給許多人戴上了“共产党”的帽子，剥夺了他們被选入議會以及在工会团体正式任职的权利。”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暂时停止向自治發展”呢？制宪委员会恬不知耻地討論了“立即归政于民选政府的企圖，即建立代議立法机构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持內閣制这一企圖所可能产生的結果。”

制宪委员会报告第211节中說，人民进步党宁願参加选举而不願抵制选举；而在选举后，人民进步党或

1、拒絕参加議會；

或，

2、在选举中获得多数票后拒絕选举部長，用这种方法来破坏議會；

或，

3、选出部長，然后再度在英屬圭亞那引起宪法危机。

可是这又有什么呢？我倒要問問。难道这越出宪法的範圍了嗎？賽維治总督不止一次地說，一切表示拒絕合作的言論都是胡說八道。拒絕合作也不行，那人民还能干什么呢？难道就只能跟着主子走并把武器交給主子嗎？

“暫時停止向自治發展”，这就是使我国無限期地陷于蕭条状态，就是使我国后退。制宪委員會的报告中說：

“我們現在还不能說，到底要多少時間才能再度循着自治的道路前进。一切都要看英屬圭亞那人民和人民进步党領袖自己，看他們什么时候才能認識到人民进步党在目前所奉行的徒勞無益的、蓄意顛复的政策不能作为英屬圭亞那宪法發展的基础。

換句話說，人民必須抛弃自己的目前的領袖。人民不这样做，他們在很長的時間內就休想举行选举。制宪委員會显示了一下高压手段，但并不仅局限于这个公开的威胁。委員會建議采用收买賄路的手段，散布机会主义思想、分裂情緒和种族歧視，即采用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这个慣技。

委員會希望政府用各种補助金，用倉卒决定的社会和經濟改善来把人民拉到政府那一边，来使人民离开目前的領袖引导人民走的“过激主义”道路。

我們也正應該在这一点中找出目前临时政府所以重視住宅建設的原因。可是，即使在住宅建設問題上，临时政府

也是無能為力的。

“殖民地開發公司”的一位負責官員曾經嘲笑地說，政府未必能完成最近兩年內建設計劃的10%。在以前，各屆政府總是借口缺乏正確加工的和標準化的木材來掩飾自己不干事情。“殖民地開發公司”在豪斯頓新建了一所鋸木廠。這所鋸木廠可以把我們住宅問題上的苦惱一掃而光。

現在已不能再用以前慣用的借口了。新建的鋸木廠不但發揮了全部生產能力，而且已經生產過剩了。“殖民地開發公司”有200萬英尺木材賣不出去，堆在堆木場上。更使人煩惱的事情，是“開發公司”儘管在去年不止一次地採取辦法，但到現在還不能得到木板的標準尺寸的資料。結果在該鋸木廠，第二班停工了，160余名工人被拋到街頭，加入了失業大軍。

制憲委員會承認我國沒有一個政黨能在最近的將來代替人民進步黨的地位。它認為唯一的辦法是利用思想上的和種族的不同在人民進步黨的隊伍內製造分裂。委員會把人民進步黨的領袖分成共產主義“過激分子”和社會主義“民主人士”兩類，建議後者和共產黨人斷絕關係并把英屬圭亞那的人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我已經說過，1952年牙買加人民民族黨開除了所謂“赤色分子”：理查德·哈特、亞瑟·亨利、肯·希耳和弗蘭克·希耳。但是那時有一件事情我沒有提到，現在我想強調一下。那就是人民民族黨採取這一步驟後反帝國主義和反布斯塔曼特*的力量的削弱。現在在牙買加，反對布斯塔曼特的已經不是一個統一的政黨（人民民族黨）和統一的工會

* 布斯塔曼特是親英政黨牙買加勞工黨的魁首。——中譯注

战綫(职工大会)，而是三个互不联系的工会团体和政治团体。

制宪委员会希望在英屬圭亞那也是这样。

此外，委员会企圖在我国人民中散布种族敌視情緒。为此，它向主要的种族——印度人——进攻。委员会說印度人已經脫出以前的昏睡状态。它又拿出以前常用的吓人的法宝，說印度人在教育和商業方面的成就威胁到其他种族、尤其是人数占第二位的非洲人的福利。

委员会断言：“他們在这兩方面的成就使居民中的非洲人感到惊慌。不能否認，自从1947年印度独立后，在英屬圭亞那的印度人中間可以看到民族运动高涨的現象。英屬圭亞那的非洲人曾經放胆告訴我們，說英屬圭亞那的許多印度人等待着英屬圭亞那不再成为英联邦的一部分而参加东印度帝国的那一天到来。这样的結果是种族敌視的尖銳化。在目前，各种族之間的关系很緊張。表面看来平靜無事，其实瀰漫着互相猜疑、互相不信任的气氛。”

“东印度协会”主席克·魯·雅各布起来反对这种說法，他把它叫做“純粹是捏造的謊言”。雅各布說：

“目前我国存在着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团结。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圭亞那人才看到了1953年的陰謀。这个陰謀的結果，是死丁頓宪法被廢除。”

最后，制宪委员会还准备一旦把英屬圭亞那人民推上該委员会周密筹划的背叛变节的道路，就頒賜一部新的宪法，企圖以此来引誘英屬圭亞那人民。新的宪法实际上就是稍微修改了一下的、更殘缺不全的死丁頓宪法。这部宪法規定，未来的行政會議应由五名民选委員、五名官員和任命的委員組成，并由总督主持。总督具有一票决定性的表

决权。这完全証实了我在第101頁上所作的預言：

“对这个委员会的調查結果是沒有什麼可以怀疑的。李特尔頓已經在英国下議院說过，如果在英屬圭亞那那行政會議中占多数的是官員，那末在英屬圭亞那就不会發生任何騷乱。”

委员会还建議任命一个全权特派員来处理徹底改革全部地方政府制度的問題。我在上面已經說到过反民主的地方政府結構以及我們准备在这一方面实行的改革。在今日的独裁制度下会实施普选权并廢除議員任命制度大概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不論是地方政权机关的結構还是它的权力，都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在最近几年內不再举行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佐治敦和新阿姆斯特丹市政委员会的选举本来應該在1954年10月举行，現在已經無限期地拖下去了。不久以前，“官报”上發表了一項新的法案。這項法案無疑在很大的程度上預決將要發生的事件的性質。

根据這項法案，总督將获得比現在更大的权力。民选議員的席位空出(死亡、退休或屆滿)时，不再补选，而由总督直接任命一个新議員来代替他。市政委员会委員选举市長时，如果两个候选人获得的票數相等，总督有权在这两个委員中任命一个市長。而在以前，根据市政委员会法令，这种决定性的权力是屬于选民的。

罗伯遜委员会的决定，其实質可以归纳如下：

你們可以投票，但是你們不能把票投給那些准备为你們的利益而奋斗的人。你們要坚持，就剝夺你們的投票权。只有你們清醒过来，驅逐你們的战斗的領袖，只有背叛你們的反帝政策，你們才能重新得到投票权。

这种对民主的解释是和李特尔頓在1953年10月9日所采取的行动一致的。而新任殖民大臣艾·倫諾克斯—波伊德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不同的只有一点：倫諾克斯—波伊德在無限期地“停止向自治發展”這個問題上同意委員會的意見，不过他特地声明，目前由总督任命的立法會議及其六名在选举中遭到失敗的候选人（其中五名甚至丧失了保證金）必須在1957年10月停止活动。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罗伯遜委員會的观点的。比如，“曼徹斯特衛报”警告說：

“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圭亞那重新陷入最近50年来的停滯状态。不能为了頑强的官僚政治而拒絕民主。讓賈根重新執政并讓他繼續他的活动，这要聰明得多。”（着重点是我加的。——契·賈根）

“停滯”这个字眼在这里用得不够正确，因为它不够确切。我国現在不是“停滯”，而是向后退。我們去年一年內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向后退。

“官僚政治”甚至摧殘了我們以前有过的那些有限的权利。我在監獄中渡过了几乎六个月，只因为我似乎違反了总督的命令，即把我的行动自由限制在佐治敦区的命令。实际上，逮捕我的时候，我正在診所接待病人。而这个診所恰恰在佐治敦市外35英里的地方。

另外有些人由于据說是他們犯的罪也惠顧了女王陛下的監獄。实际上，他們之所以被捕，只是因为利用了英国政府批准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公約中所保障的权利。下面就是这些人的名單。

由于保藏“顛复性”禁書而被捕的有：前衛生与住宅建設部部长杰·普·拉奇曼辛格；前众議員穆罕默德·汗和弗列

特·鮑曼。

由于組織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而被捕的有：納斯魯亭、薩林、阿乔特哈·辛格、斯·拉奇曼辛格、馬丁·卡特、艾利克·韓德雷、罗里·韋斯特馬斯、潘迪特·米齐尔、尤思塔斯·山姆、列雷·董康、爱德温·麦尔庫留斯、艾利克·勃賴特威德、米尔屈列特·拉摩迪特、侯賽英、西席尔·山姆普遜、理查德·維尔倍盖。

由于沒有到警察局办理每日登記的手續而被捕的有：弗列特·鮑曼、雷姆·卡蘭和罗里·韋斯特馬斯。

人民进步党总書記簡奈特·賈根到現在还关在監獄里。由于組織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由于保管禁書和警察局鎮压騷乱的指令的副本，她四次被判徒刑三个月。

某些人仅仅由于喊了“永远跟着人民进步党走！”和“人民进步党万岁！”就被判处徒刑和罰款。

去年英軍剛在英屬圭亞那登陸，就有五人被捕。其中有交通与公共工程部長悉尼·金和兩位众議員。目前有八人在英季辽尔瑪薩拉尼一賽特尔門集中营里受罪。

罗伯遜委员会的建議也遭到英国工党議員理查德·克罗斯曼辛辣的批評。克罗斯曼在“星期日画报”上写道，英国在向俄国遞照会抗議它在东德禁止自由选举之前，應該先想想自己的两个殖民地——塞浦路斯和英屬圭亞那。“理由是很清楚的”，克罗斯曼加上这样一句。

如今，英国政府的“用巩固殖民地政治与經濟基础的方法促使殖民地人民向民主自治前进”这一类虛伪的言論已被揭穿，英国的工党运动必須公开說明自己的立場。它支持罗伯遜之流种种反动的限制，还是繼續忠实于古老的民主原則：政府代表人民、受人民領導并为人民服务？